

资讯信息 仅供参考

高教决策参考



2025 | 23

第2卷第23期

总第34期

上海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目录

高教动态 1

第八届综合性大学教育学科建设与发展论坛在湖北大学举办	1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习科学研究分会 2025 学术年会召开	2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组织召开省级高等教育学会工作座谈会	5
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成立 40 周年大会在南京召开	5
第四届高等教育青年学者论坛在苏州大学举行	7
“沪蒙高校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教学改革创新交流会”在呼和浩特市举办	9
第三届高校教师数字素养发展与数字化转型学术研讨会举办	10
第二届全国高校数智思政学术研讨会举办	10
国际动态 英国发布《16 岁后教育与技能白皮书》系统阐述全面教育改革方案	11
国际动态 英国发布 2025 年 HEPI / KAPLAN 软实力指数报告 哈佛和牛津位居榜首	13
国际动态 美国发布《2026 年高等教育格局报告》呼吁高校领导者就高校未来做出根本性抉择	15
国际动态 希腊高等教育迎来历史性突破	17
院校动态 同济大学以辅助决策驾驶舱建设推动教育治理数字化跃升	18
院校动态 曲阜师范大学庆祝建校 70 周年	20
院校动态 华南师范大学庆祝在澳办学 40 周年系列活动在澳门举行	21
院校动态 浙江师范大学举办第四届“智能时代的德育”学术研讨会	22

高教研究 24

学科专业调整的合法性危机：高等教育“就业导向”与“育人本位”的价值调和研究 季玫希	24
我国 2024 年度高等教育数字教材典型案例全面分析 许焘 毛芳	32
“十五五”规划编制 未来五年教育怎么干？“十五五”规划建议指明方向	43
“十五五”规划编制 面向教育强国建设：高校“十五五”规划的战略主题 周光礼	45
“十五五”规划编制 “十五五”时期教育改革发展面临的形势、问题与思路 马晓强	47
院校研究 论院校研究的主体 刘献君 赵彩霞 周进	50



高教决策参考

高教决策参考
2025 年第 23 期
第 2 卷第 23 期·总第 34 期
2025 年 10 月 31 日发布

上海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200234 上海市桂林路 100 号
徐汇校区西部计算中心 2 楼
<https://ghc.shnu.edu.cn>

院校研究 高校职能部门开展院校研究的实践形式、现实问题与提升路径 张俊超 牛睿	62
人工智能 当教育留下伤痕：学生为何依赖人工智能（AI）的代笔困境 埃内斯 托·雷耶斯	71

他山之石 73

博士学位制度的法国模式：特点与争议——以专业博士学位设置为中心的考察 卞翠 卢威 孙阳	73
美国博士研究生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跨学科创新及其启示——基于斯坦福大学 SHIPS 项目的案例考察 田贤鹏 史洁	74
专业学位博士生教育中的档案袋评价：缘起及其在英、美、澳的实践 王东芳 刘晶	74
英国教育博士实践能力的培养路径与启示——基于伦敦大学学院教育学院的案例研究 李文文 张金鹏	75
学科评估如何以评促建：美国明尼苏达大学 GRIP 计划的实践与启示 崔育宝 吴兆胜 秦进	75



高教动态

第八届综合性大学教育学科建设与发展论坛在湖北大学举办

第八届综合性大学教育学科建设与发展论坛10月24—26日在湖北大学举办。与会专家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就“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教育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设”这一重大时代命题展开学术研讨。来自全国高校的百余名院长及教师代表参加了本次论坛。

与会专家认为,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及人工智能时代的挑战和机遇,回应“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教育学科建设与发展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包括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服务于教育强国建设,服务于统筹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加快构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作出贡献。教育科学建设要扎根中国大地,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教育传统,吸收借鉴国外先进教育思想,建构中国特色教育学,为共同解决世界教育难题贡献中国教育的智慧和方案。

与会专家就综合性大学学科建设与发展规律、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教育学科的使命和责任、多学科融合发展背景下新时代教育学的发展逻辑和路径、大科学时代教育科研的变革趋势、人工智能时代教育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机制、教育学原创知识图谱建构和标识性概念等进行深入探索。与会专家还聚焦提升“优师计划”师范生培养质量、综合性大学教师教育发展策略、跨文化语境中教师文化敏感性等提出有针对性的研究成果和推进建议。

“综合性大学教育学科建设与发展论坛”由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和天津大学教育学院于2018年倡议发起,至今已举办八届。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石中英教授表示,八年来,论坛着眼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教育科学,有力推动了新时代我国综合性大学的教育学科建设。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院长蒋凯教授认为,高校在教育学科建设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需要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开展有组织科研、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等。论坛为高校同行对此进行深入研讨和交流搭建了平台。

本次会议在湖北大学举行。据湖北大学校长刘建平介绍,学校近年来积极探索地方综合性大学举办师范教育的新路径,以教育家精神铸魂,以培养模式改革强基,以体制机制创新聚力,以优质资源配置赋能,建构起“统分结合、以统为主、协同育人”的师范教育新格局。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习科学研究分会 2025 学术年会召开

年会开幕，聚焦智慧教育新范式

10月17-19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习科学研究分会2025学术年会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年会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习科学研究分会主办，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承办。本届年会以“智创未来：学习科学与智慧教育新范式”为主题，来自学习科学领域的专家学者、一线教师与校长、教育行政部门领导和研究人员、以及关心支持学习科学发展的各界人士共500余人现场参会。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秘书长李楠，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张雁云，分会理事长、燕山大学党委书记赵险峰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分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尚俊杰教授主持开幕式。分会副理事长、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部长张婧婧教授作大会程序委员会工作报告。

李楠向学习科学研究分会2025学术年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他指出，学习科学兼具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双重属性，分会作为学会系统中研究教育基础科学问题的重要力量，在促进教育教学改革、推动成果转化和服务教育强国建设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他强调，建设教育强国要回到教育科学的原点，把教育理念、内容与方法的现代化作为关键路径，深入研究教育的科学规律，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他表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将继续支持学习科学研究分会的发展，分会要将落实学会总体战略作为重点任务，持续增强会员服务意识，创新开展学术与实践活动，不断完善制度建设，争创一流分支机构。

张雁云代表北师大向出席年会的各位领导、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并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他介绍了北京师范大学在教育学与心理学领域的领先成果，指出学习科学是推动教育变革与创新的重要动力。他表示，北师大将继续扎根中国大地，立足时代需求，深化学习科学研究，推动科技与教育深度融合，不断提升育人质量。学校将以更开放的姿态加强与专家学者的交流合作，在学习科学领域持续探索，为建设教育强国、推进教育现代化贡献“北师大智慧”和“北师大力量”。

赵险峰在致辞中指出，学习科学研究分会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的坚强领导和悉心指导下，

立足自身职能和学术特色，聚焦国家教育改革发展重大战略任务，在理论创新、学术交流、人才培养与社会服务等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分会的学术创新力、服务支撑力和组织凝聚力显著提升。他强调，燕山大学作为理事长单位，将坚守服务会员、凝聚共识、推动创新、服务发展的宗旨，会同各理事单位搭建高水平学术交流平台，与广大会员、专家学者携手，共同书写学习科学事业发展新篇章，为全面推进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主旨报告，探索学术前沿热点

本届年会邀请了北京师范大学原校长董奇教授，西南大学教育学部部长朱德全教授，浙江大学本科生院院长吴飞教授，清华大学人工智能教育研究所所长韩锡斌教授作主旨报告。

董奇教授作“研究脑智发育规律，促进学生健康成长”主旨报告，从“关注脑、理解脑、促进脑、适应脑、研究脑”五个方面系统阐释了脑智发育对学生学习与健康成长的科学规律。他指出，深入理解儿童青少年的脑智发育规律，是智慧教育创新与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基础。他介绍了国家2023重大科学计划“中国学龄儿童脑智发育队列研究”，结合最新脑科学研究成果，强调睡眠、运动、音乐、阅读等因素对脑智成长的重要作用，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与个体差异。

朱德全教授作“学习的多样化通道与发展的多元化路径”的主旨报告，提出三个核心观点：了解学习的新脑作用机制并遵循学习规律；在遵循规律中学会学习；在多元化学习通道中实现多元化发展。报告系统阐述了读、听、讲、看、写、做、问、想、处九种学习方式的新脑作用机制和价值逻辑，强调要通过多种学习通道提升学术能力，培养系统性思维，实现全面发展。

吴飞教授作题为“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与人才培养”的主旨报告。他系统阐述了人工智能作为通用目的技术对教育体系与人才培养的深远影响，介绍了浙江大学在人工智能通识教育、教材建设及数智化教学方面的创新实践。他重点分享了“智海·三乐”学科大模型与“智海-摹”实训平台在教学中的应用，以及“AI+X 微专业”《人工智能素养红皮书（2024版）》等成果如何助力高校AI教育普及。吴飞教授强调，人工智能教育的使命在于“把会读书的人培养成为会创造的人”，呼吁以教育引领科技，以智能塑造未来。

韩锡斌教授作题为“教育大模型建设与应用：挑战与对策”的主旨报告。报告提出了构建“人机协同问题解决”教学框架的解决方案，强调要从真实工作场景出发设计典型任务，通过行业能力图谱重构知识体系。他表示，需要建立政府主导、多方协同的生态体系，包括

制定统一标准、建设共享算力平台、开展与日常教学深度融合的教师培训等具体对策，最终实现行业-专业大模型在价值塑造、能力培养和知识传授方面的平衡发展。

圆桌研讨，不同思想交流碰撞

特邀圆桌环节，多位专家齐聚一堂，围绕“AI 对学习科学研究范式的影响：机遇与挑战”进行研讨，就人工智能如何重塑学习科学研究范式、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等核心问题展开思想碰撞。

LS8“中学生拔尖创新人才研讨营”的21名学生代表汇报了自己的研究成果，涵盖人工智能、心理健康、生态环境、智能监测、社会服务等多个领域，充分展现了中学生的科研创新能力和社会责任感。

“期刊面对面&读者对话”专场活动邀请了国内多家教育类核心期刊主编与编辑代表围绕“AI 辅助写作的学术诚信边界”“AI 署名与作者身份界定”与“出版模式创新与技术速度匹配”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入讨论，为推动学习科学研究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思考与动力。

学习科学青年学者圆桌研讨环节，聚焦“青年学者视野中的学习科学新图景”主题，青年学者们分享了自己的研究领域和跨界经历，就人工智能时代研究范式创新与融合、人工智能在重塑教育研究和实践边界的过程中给青年学者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等方面展开了讨论，并给出了各自认为在未来最有发展潜力的议题。

论坛闭幕，发布最新研究成果

闭幕式上，北京师范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副院长王志春向大会发布重磅成果教育学智思体研发及应用。该成果是教育部科学技术与信息司“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专用大模型建设项目”的阶段性成果，由北京师范大学人工智能学院与教育学部联合攻关。学习科学研究分会组织专家，积极参与“教育学智思体”模型中教育理论框架与教学场景构建等关键环节。作为教育学学科的专用大模型，“教育学智思体”1.0版本的发布，为我国教育学学科体系建设和教育强国建设注入了新的智慧动能。

（来源：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微信公众号）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组织召开省级高等教育学会工作座谈会

10月24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以“加强联动 深化合作 服务教育强国建设”为主题,在南京召开省级高等教育学会工作座谈会。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以下简称“学会”)会长林蕙青出席会议并讲话。学会副会长葛道凯作会议总结。

会议指出,学会召开首次省级高等教育学会工作座谈会,既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具体行动,也是落实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和三年行动计划的关键举措,更是回应“教育强国,学会何为”时代之问的重要实践,时机特殊且意义深远。

会议强调,在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新征程上,学会系统要结合学会职责定位和工作实际,找准工作着力点、突破口。围绕加强省学会工作,一是要把准政治方向,合力担负高等教育发展使命;二是要聚焦学术研究,协力打造新型高端智库;三是要共建品牌活动,搭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平台;四是要加强国际合作,拓展高等教育开放合作新格局;五是要提升治理水平,完善学会系统协作联动体系,切实推动学会系统提高服务教育强国建设的质效。

座谈会上,省学会围绕学会系统协同联动机制构建、区域协作机制建设、激发组织活力与提升服务能力的建议举措等议题展开交流,思想观点碰撞融合,形成广泛共识。青海省教育厅、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等教育行政部门围绕所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情况、省内学会筹备考虑情况,以及与省学会的交流合作情况进行介绍。

会议总结指出,学会将在资源统筹、平台搭建、品牌建设等方面给予省学会全方位支持。通过构建常态化互动机制、务实推动区域协同发展、共建共享专家库资源、联合推进科研攻关四项行动计划,以更开放的思路、更活跃的状态、更务实的行动,激发学会系统干事创业热情,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贡献力量。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

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成立40周年大会在南京召开

10月25日,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成立40周年大会在南京工程学院召开。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林蕙青,江苏省教育厅副厅长杨树兵出席并讲话。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会长丁晓昌,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江苏省政协常委、教卫体委员会主任、分党组书记葛道凯,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秘书长吴英策,广东省高等教育学会会长李大胜,江苏省学位与研究生

教育学会会长袁靖宇等出席大会。来自省内外学会代表、教育行政部门负责人、高校负责人、专家学者及学会理事监事等 400 余人参加会议。大会由丁晓昌主持。

林蕙青高度评价了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在推动江苏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和作出的重要贡献。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希望省学会发挥好“思想库”“智囊团”作用,为政府科学决策、高校创新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广泛团结全省高教战线工作者,更好扛起立德树人责任,加快培养“经师”与“人师”相统一的优秀教师队伍;立足长三角区位优势,全面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深化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促进区域高等教育协同发展;主动适应新形势新需求,与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同频共振,在服务中获支持、谋发展、作贡献。

杨树兵对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成立 40 周年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他指出,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成立 40 年以来,紧紧围绕江苏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大局,深耕学术研究,聚力决策咨询,拓展专业服务,桥梁纽带作用日益彰显,参谋智库作用持续强化,人才培养支撑扎实有效,学术引领地位更加巩固,为江苏高等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他强调,高等教育是教育强国的龙头,更是教育强省建设的核心引擎。希望江苏高教学会坚守初心,服务全局,以更高站位推动教育强省建设;聚焦前沿,团结协作,以更优学术推动高等教育的改革创新;规范治理,从严治会,以更严要求提升学会发展效能。相信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一定能在新征程上再创辉煌,为教育强国和教育强省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大会授予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原会长葛锁网“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突出贡献奖”,授予南京大学龚放、南京师范大学胡建华、苏州大学周川“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研究卓越成就奖”。大会颁发了 2024 年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特等奖代表、第五届江苏省本科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优秀组织奖代表。

40 年来,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秉承“学术立会、服务兴会、合作强会、规范办会”的方针,以四位一体模式推动发展,实现四大“双突破”,持续助力江苏高教高质量发展。截至目前,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已拥有 175 家遍及全省的高校会员单位、一批高等教育相关企业会员单位、21 家分支机构,获得首批江苏省先进社会组织称号和第五次全国先进社会组织推荐资格。

(来源: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微信公众号)

第四届高等教育青年学者论坛在苏州大学举行

10月24—25日,第四届高等教育青年学者论坛于在苏州大学召开。本次论坛由《高等教育研究》杂志社、苏州大学期刊中心、苏州大学教育学院联合主办,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担任学术指导单位。来自全国各地多所高校、研究机构的资深学者、青年学人及多家学术期刊主编、编辑150余人参会,共同探讨“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加快教育强国建设”这一主题。苏州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姚建林出席论坛并致辞。开幕式由苏州大学期刊中心主任、《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副主编江波主持。

开幕式上,姚建林代表学校向论坛的召开表示祝贺,向与会嘉宾表示诚挚欢迎,并介绍了苏州大学的悠久历史与发展情况。他指出,苏州大学学报作为学术交流重要阵地,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为苏大学科建设作出了突出的贡献。高等教育青年学者论坛作为学校精心打造的一项学术品牌活动,是推动学术共同体建设、服务青年人才成长、服务国家战略发展的重要举措。

《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主编张应强在致辞中提出,青年学者是我国高等教育学科建设和高等教育研究的生力军,学报将致力建设成为“青年学者友好型期刊”。他同时向青年学者表达殷切期望,强调学术论文的核心是思想与观点,围绕“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这一重大政策命题,学者应着力探究其中的理论问题,为政策的实施与完善提供学理支撑。

苏州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冯成志代表主办方之一致辞。他介绍了苏州大学教育学院的历史渊源和近年来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方面取得的成果,认为学院研究方向与论坛主题高度契合,期待青年学者通过论坛碰撞思想、凝聚共识,推动高等教育学术共同体发展。

大会报告

论坛主题报告报告环节分上下半场,上半场由《高等教育研究》副主编曾伟主持,华南师范大学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发展高等研究院院长卢晓中、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刘振天先后作报告。

卢晓中提出高校分类改革需实现精细化、协同化、动态化。他强调精细化须明确高校类型划分的量化标准与多元定位空间,协同化要推动学科专业、人才培养、评估体系联动,而

动态化须建立科学的转型调整机制，为高校特色发展提供明确指引。

刘振天提出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适应 — 胜任 — 引领”三重使命。适应是前提，需主动对接国家战略与社会需求；胜任是核心，聚焦人才培养、科研创新等核心能力提升；引领是目标，要前瞻性把握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方向，为国家发展塑造优势。

主题报告下半场由人大复印资料《高等教育》编辑张磊主持，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长周海涛、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王建华、苏州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曹永国依次报告。

周海涛以教育学科为例，探讨学科建设与内部治理创新问题。他指出学科建设需明确特色定位，加强人才梯队与平台建设，进行交叉融合，营造学科文化生态；还提出了强化学校规划与学院实践衔接、学术治理与行政治理协同的具体机制、路径。

王建华提出教育强国建设的三重承认境界。一是政策目标层面的政府自我承认，明确2035年建成目标；二是评估指标层面的学界他者承认，需警惕指标误导；三是全球标杆层面的世界公认，强调教育强国需与国家崛起同步，最终实现实至名归的全球引领。

曹永国聚焦分类评价、多元承认与理论创新。他指出当前分类评价存在物化、同质化、过度精细化等问题，倡导多元承认以尊重学术差异与个体价值；批判“设计性创新”的表面化倾向，强调理论创新需研读经典、回应社会重大问题，通过社会实践经验推动思想重建。

分论坛

会议共设6个分论坛，每个分论坛分上下两个半场，由24位知名学者、编辑担任主持人与点评嘉宾，42位参会代表汇报了各自的最新成果。分论坛主题涵盖了高等教育理论、比较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生教育等领域以及高等教育评价改革、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人工智能驱动下的高等教育变革等前沿议题，代表们就此展开了热烈的交流。

青年编委会会议

会议期间，《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编辑部还召开了青年编委会会议。20余位青年编委以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参与研讨，为期刊建设建言献策。会议明确了未来的期刊发展路径，并确立了重点组稿方向。

闭幕式

闭幕式上,江波做会议总结。他强调,论坛以“青年”为名,旨在与年轻学者共同成长。期刊将继续以“关注国之大计”并“培养年轻学者”为使命,致力于打造植根苏大、面向全国的教育学术高端平台,并推动论坛走向持续化、品牌化、长效化,为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与改革注入不竭动力。

(来源: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微信公众号)

“沪蒙高校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教学改革创新交流会”在呼和浩特市举办

10月23日,由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和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指导,内蒙古大学主办的“沪蒙高校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教学改革创新交流会”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举办。来自沪蒙及北京市的56所高校代表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人工智能教育改革创新与区域教育教学协同发展新路径。

近年来,沪蒙两地深入落实双方教育合作协议,多所沪蒙高校在学科共建、师资互派、人才联合培养、人工智能赋能教育发展等领域开展了一系列务实合作。“推进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教学改革,是破解内蒙古高等教育区域发展不平衡、优质资源供给不足瓶颈的关键举措。”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李伟指出,“希望内蒙古高校通过此次交流,深入学习上海的前沿理念与实践路径,加快补齐智能教育短板,同时发挥内蒙古绿色算力优势,为上海高校开展人工智能科研、大模型训练提供稳定高效的算力支撑,进一步深化‘上海技术+内蒙古场景’合作模式,催生更多教育创新成果”。

会议邀请了北京大学教务长办公室主任、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主任孙华教授,复旦大学人工智能教育教学创新中心副主任云永旺,分别以《在数智时代重塑高等教育、推动教师发展》《复旦大学“AI大课”建设情况》为题作主旨报告。来自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的专家学者开展深度研讨与经验分享,为沪蒙两地高校推进人工智能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建言献策。

此外,与会代表还将实地考察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新区城市大脑及数字化展示中心、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等地,进一步了解内蒙古自治区绿色算力布

局。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

第三届高校教师数字素养发展与数字化转型学术研讨会举办

10月19日，“素养引领·智能升级·共创未来——第三届高校教师数字素养发展与数字化转型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2025学术年会‘教师数字素养发展’分论坛”在湖北武汉举办。

研讨会由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未来教育专业委员会和华中师范大学主办，旨在切实推动数字化赋能教师发展行动，开辟教师发展新赛道，塑造教师发展新优势，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深化教师队伍改革创新，聚焦高校教师在智能时代的素养提升、能力重塑与教学创新。

教育部教育数字化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宗凯表示，在智能时代背景下，教师角色的转型与能力提升是核心关键，亟需提升数字素养、转变教学角色、增强专业能力，以适应智能技术引领的教育变革，在转变中理念是重点，理念焕发动力。他期待本次研讨会能够结合教育理论与科研实践，展开充分交流，主动求变以应对时代挑战，开创更多新的可能。

会上，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夏立新分享了华中师范大学在教师数字素养提升方面的三大实践：以标准研评为引领构建发展新体系，以平台构建为支撑赋能教学能力提升，以实训赋能为抓手探索卓越教师培养新路径。他提出技术应用要服务于育人本质，呼吁与会者共研前沿议题、共享创新实践、共促协同发展，共同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智慧与力量。

与会专家深入探讨了人工智能赋能教师专业发展的实践模式，分享了智能教学平台建设、精准教研推进及数字素养评价体系构建的前沿经验。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

第二届全国高校数智思政学术研讨会举办

为深入探讨数智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改革路径与实践经验，推动思政课守正创新、提质增效，10月17日至19日，第二届全国高校数智思政学术研讨会“数智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与实践”在厦门大学召开。

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南大学、中山大学、中南大学、厦门大学、福州大学等高校以及期刊报纸编辑部的 160 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

与会者围绕“数智时代思政课建设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思政教育”“大语言模型与大学生价值观引导”“教育强国背景下思政引领力”“新课改方案与思政课课程改革创新”“新时代思政课教师数字素养提升”等议题展开深入探讨和交流。本次会议主题兼具前瞻视野和现实关怀，将有助于推动数智时代高校思政课的改革深化与实践创新。

近年来，作为主办方之一的厦门大学围绕数智思政，积极探索以新技术赋能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持续推动思政课教学模式实现改革与升级。

本次会议由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思想道德建设专业委员会、北京科技大学思想政治工作研究院、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厦门大学）和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联合主办。

（来源：福建省教育厅官网）

国际动态 | 英国发布《16 岁后教育与技能白皮书》 系统阐述全面教育改革方案

阅读提示：10 月 20 日，英国政府发布《16 岁后教育与技能白皮书（Post-16 education and skills white paper）》，白皮书概述了英格兰 16 后教育和技能系统的改革，旨在满足经济需求、弥补技能缺口并支持经济增长。改革涉及高等教育教学和研究，构建适配雇主需求、覆盖全民发展、兼具专业性与声望的 16 岁后教育与技能体系，打破个人背景与未来成功的关联，为英国培养适应数字时代与未来发展的技能型劳动力。以下是白皮书要点。

本白皮书系统阐述了英国政府为应对经济变革与技能缺口而制定的全面教育改革方案，旨在通过重塑 16 岁后的教育体系，培养适应未来需求的劳动力队伍，推动国家经济增长与个人发展机会的结合。

白皮书首先指出当前面临的严峻挑战：技能短缺已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超过四分之一的职位空缺源于缺乏合格人才；同时，全国有 850 万成年人英语或数学能力不足，730 万人缺乏基本数字技能，近百万青年处于未受教育、未就业或未接受培训的状态。针对这些问题，政府提出三大改革方向：

第一,建立雇主深度参与的协同技能体系。将通过“就业途径保障计划(Pathways to Work Guarantee)”整合技能培训与就业服务,强化成人技能基金与就业中心的协作,并大幅扩展行业工作学院计划的覆盖范围,为求职者提供包含培训和实习保障的综合支持。关键举措包括推出终身学习贷款制度,支持模块化学习路径;依托“技能英格兰”机构建立数据驱动的国家级技能需求分析机制;设立战略机构统筹地方技能发展规划;并通过“成长与技能税”激励企业加大培训投入。特别关注青年群体,实施“青年保障计划”,包括提供带薪实习岗位和长期失业青年的保底工作安排,并为所有16岁毕业生预留自动保障性学院名额,确保无人因GCSE考试后被边缘化。

第二,打造专业化且享有声望的继续教育部门。重点提升教师队伍建设质量,推行全国性的专业发展计划,并通过“产业交流项目(Industry Exchange programme)”促进职场技能向课堂转化。在资格认证方面进行全面革新:为所有学习者(包括特殊教育需求学生)设计清晰的升学路径;将“V证书(V Levels)”确立为青少年三级职业资格的唯一路径,与A证书(A levels)和T证书(T Levels)共同构成简明而高质量的教育选择框架。“技术卓越学院(Technical Excellence Colleges)”将成为这一改革的引领者,专注于高水平技术培训与就业衔接。这些措施将以保护16至19岁青年优质教育的投资为基础,优先支持高价值课程供给。

第三,巩固世界领先的高等教育体系。鼓励高校基于研究与教学优势开展专业化分工与合作,通过学费上限调整与研究经费改革增强财务可持续性。强化质量问责机制,由学生事务办公室统一监管所有高等教育提供者(包括开展高等教育的继续教育学院)。通过引入学位课程的“断点”设计增强学习灵活性,使更多四级和五级高等教育课程能够满足雇主需求并产生积极经济回报。同时完善助学金制度,加大对弱势群体攻读国家重点领域课程的资助力度,打破背景与成功之间的关联障碍。

贯穿所有改革的核心原则是明确各方责任划分:政府承担18岁以下普及教育和远离劳动力市场成人的技能培训;企业与政府共同投资优先领域的技能开发;个人则通过终身学习贷款支持自身技能提升。整个体系将采用队列式高等教育参与指标跟踪25岁以下青年的高等教育学习参与情况,并设定了雄心勃勃的具体目标——到2040年实现三分之二青年参与高等教育层级学习(学术型、技术型或学徒制),其中至少10%的青年进入四级或五级学习(含学徒制)。

这份改革蓝图体现了政府对技能人才培养的系统性思考,不仅关注当前劳动力市场的即时需求,更着眼于人工智能、人口老龄化等大趋势带来的长远影响。通过与雇主、教育机构和地方政府的紧密合作,力求构建一个响应迅速、机会均等、与经济增长深度融合的教育生态系统。

(来源:英国政府(GOV.UK)官网)

国际动态 | 英国发布 2025 年 HEPI / Kaplan 软实力指数报告 哈佛和牛津位居榜首

阅读提示: 10月23日,英国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所刊发博文,介绍了英国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所与 Kaplan 国际学院最近发布的《2025 年 HEPI / Kaplan 软实力指数》报告。哈佛大学和牛津大学在软实力指数中排名领先,该指数评估了接受高等教育的世界高级领导人对国家软实力的贡献。美国和英国继续保持领先地位,分别培养了 66 位和 59 位高级领导人。法国表现有所下降,但仍居第三。数据显示,哈佛大学培养了 15 位高级领导人,牛津大学培养了 12 位。英国的高等教育机构在软实力方面表现尤为突出,但政府的政策如国际学生税和签证费用可能对其竞争力产生负面影响。以下是博文要点。

由英国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所(The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Institute, HEPI)与 Kaplan 国际学院(Kaplan International Pathways)联合编制的《2025 年 HEPI / Kaplan 软实力指数(HEPI / Kaplan 2025 Soft-Power Index)》报告于 2025 年 10 月发布。该指数通过统计全球现任最高级别国家领导人(包括君主、总统和总理)中曾在外国接受高等教育的数量,来衡量一个国家通过教育输出所获得的全球影响力与“软实力”。2025 年的评估首次增加了按具体就读院校进行排名的维度。

在国家层面,美国以其高等教育机构培养了 66 位外国现任领导人而稳居榜首,虽略低于 2024 年的 68 位,但仍与其 2022 年的历史最佳成绩持平。英国以培养了 59 位领导人稳固保持第二位,追平了其自 2017 年该指数创立以来在 2019 年和 2021 年达到的历史最高纪录。两国表现与近年情况基本相当。法国尽管成绩从 2019 年的 40 位大幅下滑至 23 位,仍维持在第三名的位置。俄罗斯的表现则创下历史新高,共有 13 位领导人曾在其境内求学,超过了其在 2022 年创下的 11 位的纪录。印度同样取得了史上最好成绩,从 2022 年的 2 位增至 2025 年的 5 位,与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总数相同。相比之下,德国首次跌出前十名,仅培养了

4 位现任领导人，这一数字与加拿大、摩洛哥、荷兰、南非等国相当，也等同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一所院校培养的领导人数量。澳大利亚（9 位，增加 2 位）和瑞士（7 位，增加 1 位）分列第五、六位。

在院校排名中，美国的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以培养了 15 位现任外国领导人高居榜首，英国的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以 12 位紧随其后。值得注意的是，哈佛一校培养的领导人数量便超过了俄罗斯全国高校的总和（13 位），也多于意大利（5 位）、西班牙（5 位）和德国（4 位）三国之和。榜单前六名中有五所是英国院校，显示出英国在吸引未来领导人方面的高度集中性。除牛津外，上榜的英国院校还包括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Sandhurst，8 位）、曼彻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Manchester，6 位）、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5 位）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LSE，4 位）。其他培养超过 3 位领导人的院校包括波士顿大学（Boston）、布里斯托大学（Bristol）、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纽约大学（New York）、宾夕法尼亚大学（Pennsylvania）、伦敦大学学院（UCL）和美国陆军指挥与参谋学院（US Army Command and Staff College）。

报告列举了具体的领导人名录。例如，曾就读于哈佛的领导人包括不丹首相策林·托格（Tshering Tobgay）、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新加坡总理黄循财（Lawrence Wong）等 15 人。而在牛津大学受过教育的则包括比利时国王菲利普（Philippe）、日本天皇德仁（Naruhito）、匈牙利总理维克托·欧尔班（Viktor Orbán）等 12 人。

多位专家强调了国际学生对英国软实力的巨大贡献。英国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所所长尼克·希尔曼（Nick Hillman）指出，2025 年全球超过四分之一的国家拥有曾在英国接受教育的最高级领导人，这是巨大的外交资产。然而，他也警告，英国政府计划对留学生征收的税费、不断升级的负面言论以及高昂的签证成本，正在抵消设立软实力委员会和新教育出口战略等积极举措带来的好处。曼彻斯特大学校长邓肯·艾维森教授（Professor Duncan Ivison）和 Kaplan 国际学院董事总经理琳达·考恩（Linda Cowan）均表达了类似担忧，认为英美加等国当前的政策困境为英国提供了吸引顶尖人才的难得机遇，但设置障碍可能使英国错失良机。牛津大学副校长艾琳·特蕾西教授（Professor Irene Tracey）则认为，众多世界领袖选择牛津深造，本身就证明了教育在塑造思想、深化理解和激励全球服务方面的变革性力量。

软实力指数揭示了美英两国，特别是其顶尖学府，在通过高等教育培养全球领导者从而积累软实力方面的持续主导地位。同时，它也反映出全球格局的动态变化，如俄印影响力的

上升和欧洲传统强国影响力的相对减弱。报告的核心警示在于,虽然英国的教育遗产构成了其强大的软实力基础,但当前的政策取向若不调整,可能危及其未来的国际吸引力与影响力。

(来源:英国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所(The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Institute)官网)

国际动态 | 美国发布《2026 年高等教育格局报告》 呼吁高校领导者就高校未来做出根本性抉择

阅读提示: 10月20日,高等教育深度观察(Higher Ed Dive)官网刊发文章,就美国教育动力公司(EducationDynamics)发布的《2026 年高等教育格局报告》进行解读。《2026 年高等教育格局报告》指出经济不稳定、人口变化和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正在推动高等教育的市场现实发生根本性变化,迫使领导者抛弃过时模式并做出根本性决策。以下是文章要点。

教育动力公司(EducationDynamics, EDDY)发布的《2026 年高等教育格局报告(2026 Landscape of Higher Education Report)》,为正处于前所未有的结构性变革时期的院校领导者提供了一份至关重要的资源。该报告明确指出,高等教育已经跨越了一个不可逆转的门槛,旧有的运作模式已然失效,固守现状只会阻碍机构发展。经济不稳定、人口结构变迁以及人工智能的快速融合正共同塑造着一个全新的市场现实,迫使领导者们必须放弃过时的模式,并就其机构的未来做出根本性的抉择。

该报告核心理念在于,“现代学习者”(Modern Learner)已成为驱动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力量。无论年龄大小,这些学习者们普遍要求教育能够提供明确的价值、高度的灵活性以及清晰的职业成果。因此,以往那种“一刀切”的受众参与策略已彻底过时。当下的市场现实要求院校必须“在正确的地点、正确的时间,以正确的信息”与“现代学习者”相遇。教育动力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布伦特·拉姆丁(Brent Ramdin)强调,领导者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选择:要么主动进行转型,要么被动承受后果。本报告旨在通过数据驱动的分析,帮助院校将这一转变转化为战略优势。

报告重点阐述了定义此次高等教育格局转变的三个关键特征。首先,经济层面的焦虑要求高等教育重塑其价值主张。在动荡的劳动力市场和持续的经济忧虑成为新常态的背景下,仅凭传统的学位承诺已不足以吸引学生。院校现在必须围绕成本、便利性和职业成果这三个核心,向潜在的学习者传达一个清晰且无可辩驳的投资回报率(ROI)。其次,招生环境已

被永久性地重构。随着 2025 年秋季学期成为传统适龄本科人口的峰值拐点，此后该群体将面临急剧且持续的萎缩。未来的增长将与成人学习者、转校生以及数千万拥有部分大学学分却未获得文凭的美国人等非传统学生群体紧密相连，而这些群体有着完全不同的动机和期望。再者，人工智能作为变革的催化剂，正在粉碎旧的策略。虽然人工智能并非全新工具，但其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影响力正开始显现，它不仅颠覆了传统的学生招募渠道，同时也深刻改变了学术与教学过程，并重新定义了何为具有前瞻性的职业生涯。“现代学习者”正迅速接纳人工智能作为获取信息和技能发展的可信赖来源，他们期望自己所就读的院校也能具备同等的前瞻性思维。未能从战略层面整合人工智能的院校，将面临显得过时且与现代职场需求脱节的风险。

为应对上述挑战并在新时代取得成功，报告为高等院校提出了三项关键建议。第一，调整专业课程设置，使其与高增长的就业领域对齐。在一个强烈要求明晰职业成果的世界里，院校必须变得更加敏捷。这意味着需要积极投资于那些能为学生提供通往成功且具有高度流动性的职业道路的课程项目，并勇于淘汰不再满足市场需求的项目，同时利用实时劳动力市场数据来指导和加速学术创新。第二，拥抱统一的品牌与招生战略。不同学生群体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使得针对不同人群各自为政的招生策略既低效又无效。报告表明，一种横跨所有课程项目和教学模式的、单一的、强有力的品牌信息传递的统一战略，对于捕捉整个“现代学习者”市场至关重要。这种方法不仅能创造运营效率，更能展现一个连贯而引人入胜的机构故事，从而增强声誉和收入。第三，主导关于价值与成果的对话。面对公众对高等教育价值认知的不断削弱，院校必须主动界定并传达其投资回报率，以重建信任。高等教育的财务因素不能再是仅由财务援助办公室处理的次要议题，它必须成为招生叙事中首要、透明且核心的部分。

这份现已进入第六个年头的年度报告，综合了来自国家学生交流研究中心研究数据中心（National Student Clearinghouse Research Center）、美国劳工统计局（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国家教育统计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及盖洛普（Gallup）民意调查等公开数据源的信息，旨在为希望在新时期保持竞争力和相关性的高等教育领导者提供一个全面的行业分析工具。

（来源：高等教育深度观察（Higher Ed Dive）官网）

国际动态 | 希腊高等教育迎来历史性突破

希腊高等教育体系迎来历史性突破。经希腊高等教育管理局批准,四所获得官方办学许可的非国立大学将于今年11月正式开学,2025-2026学年接收首批学生,此举标志着希腊高等教育多样性发展迈入新阶段。

此次获批的四所私立大学均为国际知名高校的分支或欧洲校区,分别是雅典 UNIC 大学(塞浦路斯尼科西亚大学分校)、城市学院(英国约克大学欧洲校区)、基尔希腊大学(英国基尔大学分校)以及安纳托利亚美国大学(英国开放大学分校)。其中,城市学院所属的英国约克大学为罗素大学集团成员(相当于美国常春藤联盟),在《泰晤士高等教育》2025年全球排名中位列第146位,办学实力备受认可。

从办学规划来看,四所院校共将开设28个本科专业,覆盖人文社科、技术、管理学、心理学、生物学、医学等多个领域,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目前已有16个专业通过认证,剩余12个专业(含3个法律专业、1个医学专业)的评估工作预计本月底完成。

学费方面,因专业差异有所不同,每年介于9000欧元至27000欧元之间,医学、法律等热门专业学费相对较高,此外还需缴纳申请、注册、技术服务等额外费用。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私立大学的专业认证采用与希腊公立大学一致的严格标准,从学术适切性、研究活动,到师资配备、基础设施均纳入评估范围,由5人组成的专业学术委员会负责审核,确保教学质量。同时,院校注重个性化学生支持,通过现代化教学方法提升教学水平,并依托国际合作网络,助力毕业生增强在希腊及全球就业市场的竞争力。

不过,这些私立大学在发展初期也面临挑战。据报道,部分院校在基础设施、师资配备、专业内容方面存在问题,且不同院校的问题严重程度不同。对此,希腊教育部长索菲亚·扎卡拉基表示,11月开学时将开设完整学期课程并提供全部所需学分,目前院校认证第一阶段已完成,涉及专业与设施的第二阶段评估仍在推进中。

对于有意申请的学生,需满足多项入学要求。基础条件包括高中毕业证书或同等学历、B2及以上英语水平证书,同时需参加面试并提交个人简历、推荐信、个人陈述等材料;部分专业如医学、法律设有额外准入标准,且允许转入希腊或国际认证院校的ECTS学分。国际学生还需按规定办理学生签证,欧盟学生可分四期缴纳学费,提前缴费能享4%折扣,非欧盟学生则需遵守希腊移民法规。

希腊教育领域相关人士指出,私立大学的设立不仅为学生提供了更多升学选择,也将推动希腊学位国际认可度提升。未来,持续监督认证流程、保障办学质量,将是确保这一教育改革成功的关键。

(来源:希中网微信公众号)

院校动态 | 同济大学以辅助决策驾驶舱建设推动教育治理数字化跃升

同济大学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以人工智能赋能教育创新发展为战略方向,以辅助决策驾驶舱建设为牵引,打造智能基座,创新应用模式,全面推动教育教学、科学研究、管理服务等全链条升级,支撑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

一、以“数智化、绿色化、融合化”打造智慧决策中枢

(一)构建“数智化”协同运营体系,打造全面监测数字底座。构建覆盖数字校园基础设施、物理校园运行管理及融合校园发展成就三个维度的全域运营平台,全面梳理学校业务场景,建设智慧教室、智慧社区、智慧图书馆等21个具体场景,为学校科学治理和精准决策提供近600个监测点,推动构建“数据驱动、智能决策、协同闭环”的运营体系,实现从数据收集到智能分析再到决策支持的全流程自动化,赋能校园管理效率和质量提升。

(二)构建“绿色化”立体生态模型,形成校园可持续发展体系。依托数字孪生技术,对校园环境、建筑及重要景观进行全面空间数据采集、三维精细化建模与可视化渲染,实现校园空间、单体建筑及重要景观要素的数字化复刻与动态呈现,为智慧校园各类应用场景提供精准的空间信息支撑。汇聚实时物联数据,创新绘制校园生态地图,多渠道采集生物视频、声纹等数据,实现校园内3278棵树木的固碳能力及220栋建筑的能耗实时监测,为校园绿色发展规划、能源优化配置及生态保护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校园生态。

(三)构建“融合化”多元治理架构,全面赋能学校事业发展。以融合化为指引,聚焦党建引领、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技创新、队伍建设、国际合作、文明文化、社会服务等八大核心业务领域,通过平台搭建、信息互通与数据赋能实现数据互融共享,提供一体化决策支持,开创高校全域治理新范式。开发智能讲解、智能操控、报告撰写等功能模块,推进

运营态势实时报告、资源调度动态优化、风险管控策略建议、跨域业务深度融合，构建辅助决策新模式，助力学校事业发展提质增效。

二、以“算力、数据、模型”构建教育数字化智能基座

（一）夯实适配多学科需求的计算基础。建成“有线网+无线网+5G 专网+物联网”四网融合的立体网络架构，布局光缆环网实现校区间高速互联，部署无线接入点 3 万余个，覆盖全校区教学、办公区域和 1.6 万余间学生宿舍，提供师生免费上网服务。建成四平、嘉定、张江三中心“混合云计算+超级计算”融合架构，提供强大计算与存储资源，支撑全校多学科科研与教学需求，实时数据异地备份，保障数据安全与业务连续性。打造具备强大 AI 计算能力的超算平台，助力人工智能、仿真模拟等高性能计算任务，有力支撑 AI 驱动的学校数字化转型。

（二）构建支撑全域联动的数据中枢。建成具备数据湖仓、数据交换、数据开放等全方位数据管理和服务能力的基础数据平台，建设汇聚 54 个系统、2408 张数据表的数据湖，促进数据互联互通。推动物联平台建设，接入包括摄像头、智能水表、智能电表、防汛设备、消防设备、充电桩等 8 大类超 14 万个终端，汇聚近 10 亿条物联感知数据，实现校园环境与设施的智能感知与精准调控，提升管理效率与资源利用率。

（三）注入驱动智能转型 AI 能力。依托 40 余个行业领先大模型本地化部署，建设 AI 应用创新平台，构建覆盖教学、科研、管理等流程的智能化服务体系，研发文生图、图片理解、联网搜索、文字识别、语音识别等功能模块，助力智慧校园治理由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变。推出大模型接口服务，降低 AI 使用门槛，师生团队可根据需求，通过接口对模型进行微调，构建从模型优化、算法研发到场景应用的全链路创新体系。

三、以“创研、创用、创享”多模式服务全校师生发展

（一）构建开放型创研生态，打造工程智能转型新高地。基于校建超算平台，支持师生团队自主研发垂类领域学科大模型，如土木工程学院自主训练土木工程专业知识大模型 CivilGPT，涵盖 50 余门专业课程、14 类注册工程师考试内容，以及 2600 余本课程教材和规范文件，提供国内外 2.5 万余名专业学者数十万次问答服务，具备对土木工程复杂知识体系的精准理解与高效推理能力，将教材内容转化为知识单元，形成可视化、结构化知识体系，为教学、科研及工程实践提供智能化支持。

（二）塑造服务型创用模式，构建教学创新变革新路径。建成线上线下交互共融的智慧教学环境，上线 35.4 万小时课程资源，支撑 88.9 万人次线上学习。研发“小舟”数智学伴，整合多类型学习数据，自动生成 266 套课程知识图谱，构建覆盖教学资源个性化推荐、知识点测验靶向生成、成长路径动态规划的教学服务支撑体系，推动人才精准培育。构建“人工+智能”课堂教学质量融合评价系统，实现教学行为 AI 感知，自动产出涵盖教学设计、互动策略等维度的改进建议，助力教师精准识别教学薄弱点，有针对性地提升课堂教学质量。

（三）搭建阶梯式创享体系，培育师生共创应用新生态。面向教师、学生、管理队伍开展“AI 训练营”活动数十场，实现 AI 技术与师生创造力激发的深度融合，师生自主设计开发智能体超 1.3 万个。开展“同心云”智能体创新大赛，引导学生深挖生活学习需求，自主研发“AI 饮食助手”“诗经学习助手”等智能体；师生组队基于 22 万余条学术成果数据，研发数字“蒲公英田”，可从各学科学术成果总览到教师个人学术成长轨迹进行全面展示与分析，为人才评价和新兴交叉学科建设决策提供新维度，学校 2024 年度高层次人才同比增长 32%。推进师生成果孵化与部门共建，打造师生专属智能体创意空间与校级智能体融合门户，以“同济同学”为品牌和载体，重构校园服务体系，形成“人人学 AI、人人用 AI、人人创 AI”的可持续创新生态，赋能教育治理数字化快速发展。

（来源：教育部简报〔2025〕第 34 期）

院校动态 | 曲阜师范大学庆祝建校 70 周年

“从 1955 到 2025，变的是与时俱进的格局，不变的是兴学报国的初心；从扎根孔子故里到面向世界，延展的是学术探索的疆域，坚守的是文化自信的底色。”近日，在庆祝曲阜师范大学建校 70 周年大会上，该校党委副书记、校长张洪海全面回顾了学校弘文育人、兴学报国的奋进之路。

大会总结守正创新的办学经验，共商继往开来的发展蓝图，为服务教育强国和教育强省建设汇智聚力。从建校之初仅有的中国语文、历史、数学三科，发展为如今涵盖十大学科门类、87 个本科专业的综合性办学体系；自 2003 年实现博士点“零的突破”，到今天拥有 13 个博士学位授权点、47 个硕士学位授权点……70 年来，曲阜师范大学在人才培养、科研创新、文化传承等领域成果丰硕，以弘文育人、兴学报国的生动实践，为推动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教育强国和教育强省建设贡献了智慧和力量。

“母校赋予我们的不只是专业知识，更是一套足以受益终身的‘思想算法’和‘精神坐标’。”“老一辈曲园人的光辉足迹，引领和激励着新时代曲园人接力奔跑、勇毅前行。”校友代表、教师代表在会上表达了对母校的感恩之情与再建新功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弘文有我！兴教有我！强国有我！”会上，曲阜师范大学青年学子向母校献词，以铿锵的青春之声铭记春华秋实的历史足迹、咏赞弦歌未央的时代新章、表达“爱在曲园”的美好祝福、激扬再铸荣光的奋斗之志，向学校七十华诞致以最美礼赞。

校庆期间，该校还举办了系列学术活动、办学成果展演、艺术作品展、校友系列捐赠仪式、校史展览馆开馆、校史发布等丰富多彩的活动，秉持繁荣学术、师生至上、开放发展、双向奔赴、隆重简朴，为广大师生和校友打造了学术和文化盛会、思想与精神盛宴，镌刻了孔子家乡大学的光荣与梦想。

“尼山在望，上庠煌煌。弦歌不辍，七秩华章。”曲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邢光表示，曲阜师大七十华诞，恰逢教育强国全面布局、高位推进之年，也是“十四五”收官、“十五五”谋划之年。奋进新征程，曲阜师范大学一定坚持把牢方向、立德树人，赓续教育报国初心；一定坚持聚力创新、深化改革，激发内涵发展动能；一定坚持扎根齐鲁、服务大局，彰显更大担当作为。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

院校动态 | 华南师范大学庆祝在澳办学 40 周年系列活动在澳门举行

10月25日，华南师范大学庆祝在澳办学40周年系列活动在澳门举行。系列活动由澳门中华教育会主办，华南师大等协办。系列活动包括开幕式、新书预告会、粤港澳大湾区人工智能赋能教育论坛、学位授予仪式、签约仪式、授牌仪式等。

华南师大党委副书记、校长杨中民在活动中表示，40年前，应澳门发展所需及澳门中华教育会邀请，华南师大率先赴澳跨境办学。40年来，华南师大构建了“专一本一硕一博”全覆盖的教师培养体系，培养了澳门约70%的基础教育师资，培育近2万名优秀教师和各类人才。未来，华南师大将按照“两域三地”对外办学新布局，加快建设国际教育创新港，充分发挥“澳门教学人员研修及交流基地”平台优势，聚力推动粤澳教育深入融合发展。

澳门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表示，教青局积极与华南师大合作，新建以人工智能教育为重点的教研教育基地，共同开发人工智能教材及配套的教师培训体系。

在华南师大 2025 年澳门研究生学位颁授仪式暨研究生培养合作协议签约上，华南师范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正式授予 37 名澳门研究生博士及硕士学位。华南师大还分别与澳门濠江中学、澳门新华学校和澳门广大中学签约，合作建立“国优计划”研究生实践基地。同时，华南师大与澳门业余进修中心签署“共建博士层次人才培养项目合作意向书”，双方决定共同开展博士研究生合作项目。

活动期间，华南师大澳门办学 40 周年育人成果展览、粤港澳大湾区人工智能赋能教育论坛也同步举办。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

院校动态 | 浙江师范大学举办第四届“智能时代的德育”学术研讨会

10 月 18 日，第四届“智能时代的德育”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师范大学举行。浙师大副校长林一钢主持开幕式。

浙江师范大学党委书记蒋云良指出，今年的会议继续聚焦“智能时代的德育”这一主题，对于技术变革守住育人之本、坚守教育初心使命与道德价值内核，善用智能技术之力拓展德育广度、深度，引导科技始终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田家炳基金会高级干事甄眉舒用“感谢、初心与共勉”三个关键词介绍了田家炳先生的理念和基金会的工作：对浙江师范大学和田家炳德育研究中心秉承“以德育德”的价值追求，在推动科研创新、搭建交流平台、服务基础教育等领域做出突出成绩表示衷心感谢，阐明田家炳先生和基金会“中国的希望在教育”的坚定信念，勉励大家“诚心诚意为社会和国家做点事情”。

浙师大田家炳德育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法学院党委书记查颖教授指出，“智能时代的德育”学术研讨会自 2022 年举办以来，一直得到田家炳基金会、学术界、教育管理部门以及广大中小学校的指导、关注和参与。研讨会举办到第四届，时间并不长，然而这四年来，AI 技术的快速迭代、“硅基智慧”的不断膨胀，越来越呼唤“碳基智慧”为 AI 注入“灵魂”

——守住伦理底线、把控价值判断。

随后浙师大田家炳德育研究中心联合其他5家主办单位共同发布了研讨会成果——《智能时代的德育共识》。“共识”呼吁：以积极的姿态拥抱人工智能，为德育工作开辟新路径，塑造新优势；以人为本，坚持育人价值，促进五育融合；坚持公平正义的教育，让技术与伦理双向奔赴；大力培养数字素养，主动应对技术变革时代的育人需求；创新德育模式，促进智能技术与德育深度融合；创新德育体系，构建新的德育课程、德育资源和育人环境；转变教师角色，更新教师专业能力与伦理规范。

浙师大田家炳德育研究中心德育理论研究所所长、人文社科处处长冯昊青教授主持主旨报告。

曲阜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戚万学认为，如何界定AI参与学术和教育活动的伦理边界成为亟待解决的理论难题。为此，他从历史视角回顾了导师伦理角色演进脉络，认为AI对学术指导模式的颠覆性冲击、数据隐私与学术诚信新困境、知识权威与自主性平衡难题是智能时代的现实伦理挑战，导师伦理角色在权力结构、指导方式、指导内容、评价标准、责任主体等维度实现重置，需以价值引领的核心功能、学术道德的守护功能、“人师”的示范价值、学术求真精神的坚守来守护永恒的师道精神。

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袁振国从语言大模型向3D世界大模型发展的趋势，探讨了人工智能为德育发挥不可替代性作用的可能性和路径，特别是在具身认知、同理心培养、意志力伴随、行动习惯养成等方面的独特作用。袁振国指出，目前人工智能德育已经明显提出了三个方面的任务：一是语言大模型赋能德育工作，比如智能体对德育过程、德育经验的提炼和提供，二是人工智能运用于教育过程中产生的伦理道德问题，三是人工智能技术、产品对人际关系的重塑，人机互动的新形态产生的新的伦理和道德话题等。他指出，语言大模型基于人类语言，而语言是二维的，是对世界的抽象的表述，远远不能充分表现世界的丰富性、多样性和立体性。真实世界中，自然规律客观存在，其内在关系难以被完整把握与精准表达。基于此，他提出核心观点：语言大模型所呈现的，本质是二维的“平面世界”；而现实生活本身，却是更为丰富鲜活、维度更复杂的三维“立体世界”。他进一步表示，德育工作无需脱离现有基础，应从当下实践出发，将已被验证有效的成功经验、成熟做法，借助人工智能技术转化为可被广泛接触、便捷学习、高效推广的智能模型，从知情意行四个层面推动德育在AI时代的创新发展。

西南大学原常务副校长宋乃庆围绕“大数据时代教育测评模型的内涵、特征与意义，大数据时代教育测评模型的范式构建及其应用”等主题展开，认为教育测评模型是对反映教育现象、研究对象的关键要素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定量刻画和价值判断的标准和工具，具有定量刻画与价值判断相结合、精确性与局限性相结合等特征，应用教育测评模型可以对教育发展水平进行科学可靠的测评。教育测评模型的范式构建为教育测评模型的构建提供重要的方法和思想指导，包括确定模型构建的价值取向、明确测评对象的操作性定义、构建教育测评指标体系、收集分析指标数据与生成测评模型、验证和应用教育测评模型等主要步骤，并介绍了课业负担测评、学校特色发展测评、初中生信息技术素养测评等多种模型构建及其现实应用。

圆桌论坛由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卜玉华主持，4位参与研讨嘉宾围绕“智能时代的德育：转化、融合和创新”进行交流。

下午，同时举行三场平行论坛，分别聚焦“语言大模型价值对齐的意义和技术突破”“智能时代算法推荐对大中小学生的道德风险与防控机制”“智能时代教师的智能伦理素养”。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高教研究

学科专业调整的合法性危机：高等教育“就业导向”与“育人本位”的价值调和研究 | 季玟希

摘要：高校学科专业建设是支撑人才培养的基础平台，而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布局既要满足高校、政府、市场的需求，也要满足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诉求。基于哈贝马斯的合法性危机理论，高校学科专业调整面临两种合法性诉求：一是以就业率、经济贡献率为导向的工具合法性；二是以人的全面发展、教育本质为导向的价值合法性。两种诉求失衡便会引发危机：如只强调就业，学生可能会质疑大学的意义，无法真心认可教育的价值；如只空谈育人，学生可能会抱怨专业不利于就业，对高等教育制度失望。因此，高等教育学科调整应平衡“就业导向”与“育人本位”两种观念，研究将从理论融合、实践路径与制度设计三方面探索两种价值观的调和路径。此外，在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中，深化产教融合将成为调和“就业导向”与“育人本位”的重要突破口，应关注如何通过产教融合既提升学生

的就业竞争力，又守护教育的育人本质。

关键词：合法性危机；学科专业调整；大学生就业；沟通理性；产教融合

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根据科技发展新趋势，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人才培养模式，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培养急需人才。”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指出，“建立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超常布局急需学科专业”。在此背景下，高校应整体理顺学科专业优化调整体制机制，加快构建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高等教育学科专业体系与布局。由此可见，学科专业调整兼具重要性与紧迫性，调整势在必行，而如何调整也是急需考虑清楚的一项议题。本研究将基于哈贝马斯的合法性危机理论，辩证思考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调整中的“就业导向”与“育人本位”两种价值观的冲突表现、问题根源与调和路径。

冲突：“就业导向”与“育人本位”的双重合法性危机

哈贝马斯的合法性危机是批判社会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指现代政治系统因无法有效协调系统整合（System Integration）与社会整合（Social Integration）而产生的正当性认同危机。该理论在《合法性危机》中系统阐述，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系统面临合法性危机，即社会制度无法有效协调系统（经济、行政等工具理性领域）与生活世界（文化、教育等价值理性领域）之间的矛盾，导致公众对制度的信任丧失。其中，“系统（System）”代表工具理性的扩张逻辑，本质是以追求系统效能、经济效率为表现；“生活世界（Lebenswelt）”代表价值理性的规范诉求，本质是以主体间性理解为前提，关注规范正当性和意识共识。哈贝马斯合法性危机揭示的便是系统与生活世界的殖民关系：系统整合通过工具理性实现功能协调，但无法提供意义认同；社会整合需要价值理性的规范共识，却被系统逻辑压制，此时便需要重建工具与价值的沟通方案。此理论适用于解释高等教育领域中的问题，其中包括高校学科专业调整的合法性冲突问题。高校学科专业调整的两种合法性诉求：一是以就业率、经济贡献率为导向，体现系统逻辑的“工具合法性”。这种合法性强调教育作为人力资本生产工具的功能。二是以人的全面发展、知识传承、文化创新等教育本质为导向，反映生活世界的诉求。这种合法性要求教育回归其公共性与人文性。

1. “就业导向”失灵引发工具合法性危机

哈贝马斯合法性危机理论认为，当系统过度依赖工具理性来维持其正当性时，可能因无

法兑现绩效承诺而面临合法性赤字。在高校学科专业调整中,一种以就业率为核心指标的调整逻辑,正日益暴露出工具合法性的结构性矛盾。一是技术统治论存在治理模式上的缺陷。若教育行政部门通过就业率排名、专业预警清单等量化工具,将学科专业的存续简化为劳动力市场的信号响应,这便称之为技术统治论,而这种治理模式存在诸多缺陷。一方面,就业率等数据收集的真实性有待进一步检验,且若将人文社科等职业属性较弱的学科与就业率绑定,就违背了知识生产逻辑,如哲学等专业因低就业率不得不面临被裁撤等风险;另一方面,学科专业调整周期与产业波动周期错配,导致唯数据导向的调整可能会充满变数。二是工具理性扩张带来的连锁反应。当就业导向成为绝对命令,反而侵蚀了高等教育自身的工具合法性基础,可能会出现诸多连锁反应:院校同质化,地方高校盲目对标“热门专业”,丧失差异化竞争力;学生就业观念转变,以“慢就业”消解就业压力;招聘单位认为高校毕业生的能力与期望不匹配,反而质疑高校人才培养有效性等。

2. “育人本位”偏离诱发价值合法性危机

哈贝马斯认为,当社会系统过度工具化导致“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价值理性的式微将直接动摇制度存在的深层合法性基础。唯就业率导向的高校学科专业调整,正在消解高等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理性,进而引发双重价值合法性危机。一是教育本质异化。知识商业化,课程知识体系被拆解为就业技能包;评价指标欠佳,专业教学质量评价标准应增加对文化传承等隐性指标的考察;大学精神缺失,芝加哥大学前校长赫钦斯(R. Hutchins)倡导的“培养完整的人”理念,[1]在就业率导向下难以实现。二是学科生态失衡。学术逻辑让位于市场逻辑,多所高校在2016年—2018年间推行就业率淘汰制,部分高校后续已修订政策。在这种导向下,个别文科院系开设与原本知识结构不相符、完全迎合就业市场的行政课程。三是知识结构碎片化。高等教育重在塑造个人的知识结构体系,若为迎合就业市场的复合型人才需求,强行嫁接专业就会导致一些不符合知识演进规律的专业组合。

由此可见,当工具理性通过就业率指标全面压制价值理性时,其引发的学习动机流失、教育质量下滑与政策反身性强化,将构成一个难以打破的闭环式危机。具体闭环路径为:学科专业调整的工具理性压制价值理性→学习动机流失(转行转专业/躺平)→就业质量进一步下降→更加重视工具理性→工具理性压制价值理性。近年来,教育行政部门逐渐认可学科专业调整不能唯工具理性,同时应注重高等教育的价值理性;但在高校毕业生就业情况不容乐观的今日,唯工具理性的导向也有可能卷土重来。哈贝马斯理论明确学科专业调整必然需要协调两种价值观,否则可能会引发合法性危机。

根源：合法性危机与主体间性缺失

哈贝马斯的合法性危机理论揭示了现代社会的一个核心矛盾：“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在高等教育领域，学科专业调整的合法性危机正是这一矛盾的集中体现之一。当系统以“就业导向”为名，过度介入高校的学科设置与人才培养时，教育本身的“育人本位”价值便被工具理性侵蚀，导致高等教育丧失其原有的自主性与公共性。本部分将从哈贝马斯的“系统—生活世界”理论框架出发，分析学科专业调整合法性危机的根源。

1. “系统—生活世界”二阶社会构想提供理论分析框架

哈贝马斯将现代社会结构划分为两个相互关联但底层逻辑迥异的领域，即“系统”和“生活世界”。一是系统逻辑支配着工具理性。经济系统以金钱为媒介，追求效率最大化，如就业率、专业对口率等可量化指标；行政系统以权力为媒介，通过政策调控实现社会管理，如学科评估、院校设置等。在学科专业调整中，系统的逻辑之一体现为“就业导向”，即高校一些专业的设置必须符合市场需求，否则可能面临裁撤或缩减招生。二是生活世界逻辑是交往理性的基础。生活世界以语言为媒介，强调共识、理解与价值理性，大学职能是教学、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并以人才培养为中心任务，[2]并非仅仅输送市场劳动力。“育人本位”根植生活世界，强调传承学科知识、培养批判思维和塑造人格，即便是就业率较低的学科，也有不可替代的人文价值。因此，哈贝马斯指出现代社会的危机在于系统过度侵入生活世界，使其被工具理性支配。在高校学科专业调整过程中的典型案例为，某高校因“就业率低”“招生困难”等裁撤某专业，但未充分考虑到该专业的长期价值。[3]

2. 主体间性的缺失

合法性危机的另一根源在于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缺失，即不同利益相关者未能通过理性协商达成共识。一是决策单向度化，以行政权力为主导。当前学科调整多由教育行政部门主导，高校参与执行的全过程，而教师、学生、雇主等利益相关者缺乏实质性参与。二是形式化的民主程序使多主体交流变为伪沟通。哈贝马斯强调，真正的合法性需要建立在“理想的谈话情境”（Ideal Speech Situation）的基础之上，即所有利益相关者能平等参与讨论，而高校学科专业调整过程中，则缺乏决策民主性。三是学术共同体参与度较低。在系统逻辑下，教授委员会、学科带头人的专业判断被边缘化，即学术共同体参与不足。

3. 绩效合法性的陷阱

当教育目标被简化为可量化的绩效指标时,“绩效合法性”便成为核心机制之一,使高校学科专业调整陷入短视化困境。一是数字治理存在的弊端,使得绩效指标与社会真实需求脱节。若就业率、起薪、专业排名等数据成为衡量学科专业价值的导向标准,而教育的长期效益被忽视,那么部分学科专业虽然指标评价较低,但基层缺口极大,则会在数字导向下被裁撤。二是教育成效具有滞后性。基于统计学视角,系统要求即时反馈就业相关数据,但教育成效具有滞后性,所以数字统计不代表终身成长。三是国家顶层设计未能充分平衡短期用工需要与长期社会发展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使受教育者成为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换言之,法律文件中强调“社会需求”,但未区分短期社会用工需求和长期社会持续发展需要,这也是导致基础学科边缘化的原因之一。

调和: 沟通理性中“就业导向”与“育人本位”的共生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为破解合法性危机提供新的认识论路径。当系统世界的工具理性侵入生活世界的交往理性时,唯有通过“理想的谈话情境”下的主体间性对话,才能重建被扭曲的沟通结构。高校学科专业调整的合法性重构,本质上需要建立起政府、市场、高校、学习者之间的对话机制。已有研究者发现:学术自治具有保守性、市场调节具有功利性,因此国家牵引学科布局调整是极其必要的。[4]本研究认为,对话机制中包括多主体,但是多主体扮演的角色与功能各不相同,可通过以下调和路径进行学科专业评价。

1. 理论融合:“就业—育人共生矩阵”为重构合法性的基础

面对高校学科专业调整问题时,应明确就业率等量化指标是高等教育社会功能的必然呈现,但仍需要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终极目标,即工具合法性与价值合法性呈现出手段与目标的逻辑关系。基于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理论,本研究提出可构建包含四个象限的“就业—育人共生矩阵”,将专业发展划分为四个象限,并针对不同象限制定差异化的优化策略。该矩阵的横轴代表“就业市场适配度”,即工具合法性;纵轴代表“育人价值实现度”,即价

值合法性,通过量化评估与质性分析相结合的方式,为学科专业调整提供科学决策依据。



图1 “就业—育人共生矩阵”示意图

具体如图1所示,在象限I中,此学科专业同时满足高就业与高育人指标,表明其具备较高的就业市场需求,又能有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形成良性循环。在象限II中,此学科专业满足低就业与高育人指标,表明其短时间内就业率较低,但具有不可替代的育人价值,如一些基础学科、人文学科等,此时需要建立一些社会补偿机制,扩展就业渠道,重视学生就业问题。在象限III中,此学科专业为低就业与低育人,表明其专业既无就业竞争力,又缺乏独特的育人价值,面临双重合法性危机。此时,可以考虑启动学科专业退出预警。在象限IV中,此学科专业满足高就业与低育人指标,表明其就业率高,但育人功能弱化,易陷入工具理性陷阱,需要考虑在学科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增设一些育人环节。

与此同时,为进一步丰富“育人价值实现度”的评估维度,可考虑引入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的“发展即自由”(Development as Freedom)理论,将“育人价值”从传统的人文素养拓展为“学生实质自由的扩展”。如此一来,育人价值不仅包括知识与能力的获得程度,还应涵盖就业选择自由、认知自由、社会参与自由等。诸如:部分基础学科专业虽然短期就业率偏低,但其对“认知自由”的促进作用显著,可通过追踪毕业生在终身学习情况、公共事务参与度、社会批判能力等方面的表现得以印证,进而构建“自由增益指数”作为育人价值的补充指标。由此,象限II中的学科专业可获得更具说服力的保留依据,避免陷入唯单一市场指标的困局。

2.实践路径:多主体协商与制度创新

政府、高校、市场、学生等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价值冲突,容易造成学科专业调整的合法性危机。因此,仅依靠行政指令或市场自发调节难以实现真正的平衡,必须通过制度化的

协商机制和持续性的动态反馈来重构合法性。[5]

一是信息公开是构建交往理性的前提条件。哈贝马斯强调“理想的谈话情境”需要信息对称,若学科专业调整决策基于不透明的数据统计,便会存在系统沟通扭曲的风险。由此,教育行政部门应委托第三方机构对就业数据进行有效性验证,验证其真实性、正当性与真诚性。二是民主研讨是制度化商谈程序的构建基础。遵循主体包容原则,学科专业调整机制不能忽视学生等利益相关主体,不能将其放置于客体的位置,而是应构建多主体的参与机制。按照一定比例选取学生代表(包括在校生与毕业生)、教师(专业教师+行政管理岗教师)、企业雇主、政府部门人员,组建学科专业调整研讨会,采用改良型德尔菲法,要求各方须回应其他主体提出的意见与需求。三是伦理审查是价值理性的制度化保障。就业指标是可衡量的量化指标,而育人价值则较难以用指标量化考察。因此,应组建跨学科伦理委员会,选取不同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采用“双盲评估+交叉复议”制度,进而设置“学生的全面发展指数”。四是动态反馈是沟通理性的延时性验证。动态追踪数据库应注重多维度建设,包括职业发展、终身学习成长、社会资本积累、生活幸福感等育人成效指标。[6]与此同时,院校应注重对高校毕业生的工作生活情况进行追踪考察,形成对学科专业调整的反馈信息支撑。由此可见,多主体协商路径设计体现了哈贝马斯理论中三个关键转化,分别为:从单一决策到对话式决策、从工具理性到沟通理性、从结果控制到过程协商。

3.制度保障:预防危机的三重设计

哈贝马斯合法性危机理论中指出,晚期资本主义的制度化解方案往往陷入“系统僵化—价值冲突—信任流失”的恶性循环。针对高校学科专业调整中的结构性矛盾,需要建立具有交往理性特质的制度缓冲期,基于程序正义消弭价值冲突,进而通过制度弹性预防信任危机。

一是基于时间维度,设置缓冲制度。过渡期设计本质是为恢复交往理性提供时间条件,当高校学科专业调整行政决断遇到合法性质疑的时候,可在缓冲时间内进行再次调整与修改。此外,可实施一些创新制度设计,包括反向申诉程序,过渡期内若该专业师生能充分证明就业波动属于周期性现象,可提交材料申请专业恢复。二是基于空间维度,设置补偿制度。学分互认实质是实现不同知识体系间的交往行为合理化,如将各专业核心课程拆解为“知识单元”,在技术层面实现知识学习的跨院系结算。三是基于主体维度,设置监督制度。第三方评估的介入可起到过程监督作用,体现哈贝马斯“理想的谈话情境”中对权力不对称的矫正。

正要求。此外,第三方对高校学科专业调整的评估需要同时满足技术合理性、教学合理性、社会合理性与伦理合理性。

本文基于哈贝马斯的合法性危机理论,系统分析了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调整中“就业导向”与“育人本位”的价值冲突及其制度根源。研究表明:当前学科专业调整的合法性危机本质上源于多元主体间对话机制的缺失以及系统逻辑对生活世界的过度干预。当专业调整仅由行政指令或市场信号单向驱动时,不仅导致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压制,更造成了教育本质的异化和学科生态的失衡。破解这一问题的关键路径在于重建主体间性的对话机制,通过制度化设计,建立沟通理性的桥梁,进而实现工具合法性与价值合法性的辩证统一。[7]展望未来,深化产教融合将成为调和“就业导向”与“育人本位”的重要突破口。[8]产业需求的深度融入可以为专业设置提供更精准的就业指引,但需要警惕简单化的“订单式培养”倾向。因此,产教融合需要明确育人为先,应在空间层面建立校企协同的“教学创新共同体”;在时间层面推行“教育—就业—再教育”的终身学习闭环,动态调整专业内涵;在价值层面设立产教融合伦理评估机制,确保技术创新与人文素养培育的有机统一。只有将企业需求转化为教育性需求,而非简单移植岗位技能清单,才能实现“高就业—高育人”的良性循环。尤其需要关注的是,在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中,如何通过产教融合既提升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又守护教育的育人本质,这将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亟待探索的重要课题。[9]

参考文献

[1]季玟希.学生心目中的一流本科教育是什么——基于“手段—目标链”模型的分析[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24,23(4):107-114.

[2]史秋衡,季玟希.我国大学职能内涵嬗变的多维分析[J].高等教育研究,2021,42(4):21-26.

[3]李金桥,李乐帆.新质生产力背景下高校学科专业优化调整:价值遵循、实践困境与推进路径[J].大学教育科学,2025(3):52-60.

[4]王传毅,许钰羚.国家牵引的学科布局调整:为何牵、如何引、以何调[J].复旦教育论坛,2024,22(6):5-14.

[5]程光旭,李威,桑晓鑫.面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高校学科专业优化调整体制机制改革[J].中国高等教育,2024(18):26-31.

[6]史秋衡,季玟希.构建服务全民职后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的内涵诠释[J].教育科

学,2022,38(6):1-7.

[7]陈思宇,王洋.以学科专业布局优化调整是要推进大学创新体系升级[J].北京教育(高教),2025(5):11-14.

[8]阙明坤,倪好,季玟希.高等教育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三维解读:价值、机理与路径[J].高等教育评论,2024,12(1):87-98.

[9]史秋衡,季玟希.新时代教育体系要素变革的理路[J].高等教育研究,2022,43(7):14-21.

(来源:《北京教育》(高教)2025年10期)

我国 2024 年度高等教育数字教材典型案例全面分析 | 许焘 毛芳

摘要: 文章以 2024 年数字教材典型案例遴选活动中的 126 个案例为样本,运用案例分析法和定量分析法,深入剖析高校数字教材建设现状、问题及未来趋势。研究发现,在出版方面,数字教材的出版受政策影响呈快速增长趋势,适用对象覆盖不同教育阶段,出版平台多元化且以出版单位自有平台为主,部分已引入 AI 技术,但目前数字教材使用人数较少,市场占有率较低。当前,数字教材建设面临制度规范待完善、基础理论研究较薄弱、平台管理欠规范、应用案例不足等问题。未来,数字教材将向知识服务转型,探索产品增值策略,推动个性化学习,助力实现大规模因材施教。

关键词: 高校数字教材;建设现状;发展趋势;案例分析

在数智化时代,教育领域正经历着深刻变革,教育数字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推进教育数字化”,这一战略部署为教育发展指明了方向。作为数字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新形态教材,数字教材是推进高等教育数字化的重要一环,承载着知识传递与教学创新的重任。从当前现状看,数字教材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凭借其集成度高、互动性强、易于更新、可视化效果好[1]等优势,为大规模实现“因材施教”提供了可能。从未来发展看,新一代数字职业工作者、数字公民及其所需要的数字素养和技能,需要通过数字教育方式加以培育。

本研究对高等教育数字教材创新发展联盟(以下简称“联盟”)首届数字教材典型案例遴选活动中的 126 个案例进行分析,了解当前高等教育数字教材建设现状,剖析数字教材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展望数字教材未来发展,推动中国特色数字教材高质量发展。

1 高校数字教材出版概况

本研究对 126 个案例的出版信息情况进行分析,以期洞察我国高校数字教材的整体出版特征。

1.1 基本出版信息

基本出版信息包括版号分布、出版时间、使用对象、封面设置等。

1.1.1 电子 ISBN 号广泛应用

本次申报的 126 个数字教材案例版号以电子 ISBN 号为主,占比 81%;使用纸质图书版号的教材 24 本,占比 19%。电子 ISBN 号的广泛应用,反映高教职教领域的数字教材属于正式出版物,应取得电子 ISBN 号的共识。根据国家电子出版物管理规定,纸质出版物与电子出版物应使用不同的 ISBN 号(分别使用纸质 ISBN 号和电子 ISBN 号)。教育部 2023 年发布的《“十四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建设实施方案》中明确要求数字教材应为具有书号的正式出版物,这个书号应该是电子 ISBN 号。同时,由联盟牵头研制的数字教材团体标准也在数字教材定义中明确要求具有“中国标准书号”(即 ISBN 号)。

1.1.2 数字教材出版近年激增

从出版时间来看,数字教材的发展与国家政策导向紧密契合。2022 年教育部启动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2024 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大力发展数字教育”。在政策的推动下,数字教材出版数量在 2023 年有显著增加,2024 年继续快速增长,前 5 个月的数量已接近 2023 年全年水平,如图 1 所示。这一增长趋势充分彰显了政策对数字教材建设的强大引领作用,也反映教育领域对数字化资源的迫切需求。各出版社积极响应政策号召,加大在数字教材研

发、出版方面的投入，加速了数字教材的推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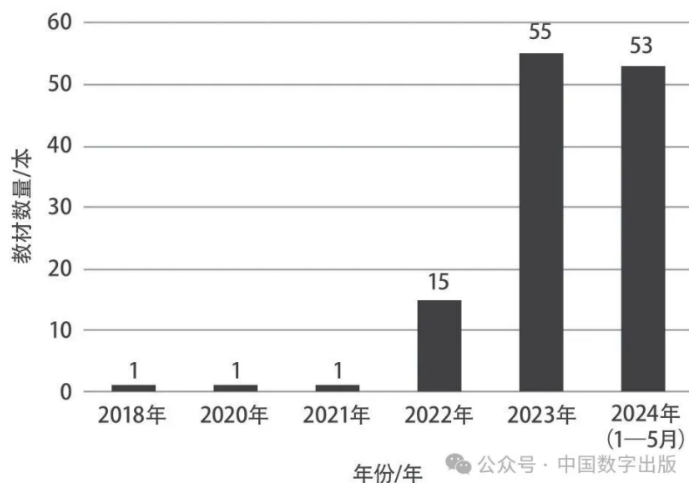


图1 数字教材出版年份及数量

1.1.3 数字教材广泛适用于不同教育阶段

数字教材凭借其灵活性与可定制性，广泛覆盖不同教育阶段和类型的学生，在中职、高职、本科、研究生各个阶段的教育中都能发挥其独特优势。粗略划分本次遴选的数字教材案例，适用于本科/研究生教育的数字教材占比 60%，适用于职业教育的数字教材占比 40%。

1.1.4 竖版封面成为主流

数字教材的封面是内容载体与用户交互的“第一界面”，承载着多重功能价值。本次申报的数字教材中 95%有封面，保留了封面的核心作用，即品牌标识、内容浓缩与视觉吸引。在有封面的数字教材中，82%的封面采用竖版图片。与横版或者正方形图片相比，竖版图片更适配智能手机、电子阅读器等设备的屏幕比例，符合用户单手持握的交互习惯，同时有利于形成统一的数字教材视觉识别体系，这与联盟牵头研制的数字教材团体标准《高等教育数字教材封面与版本记录》中建议采用竖版封面的规范也比较契合。

1.2 学科分布与数字教材类型

数字教材的学科分布差异明显，多数数字教材以纸质教材为基础转化而来。

1.2.1 工科主导的学科分布

本次申报的数字教材工科类数量最多,占比 46.03%。工科对实践操作、技术应用重视,数字教材能够通过虚拟仿真、视频演示等功能,生动展现复杂的工程原理与操作流程,为工科教学提供有力支持。文科类数字教材占比 17.46%,理科、医学、英语类教材数量相当,各占比 6.35%,艺术类占比 5.56%,农学和体育类分别占比 3.17%和 0.79%。各学科数字教材数量详见图 2。学科分布不均的状况,反映出不同学科教材在数字化转型进程中存在差异。但本次典型案例遴选为不完全抽样,不代表数字教材整体的学科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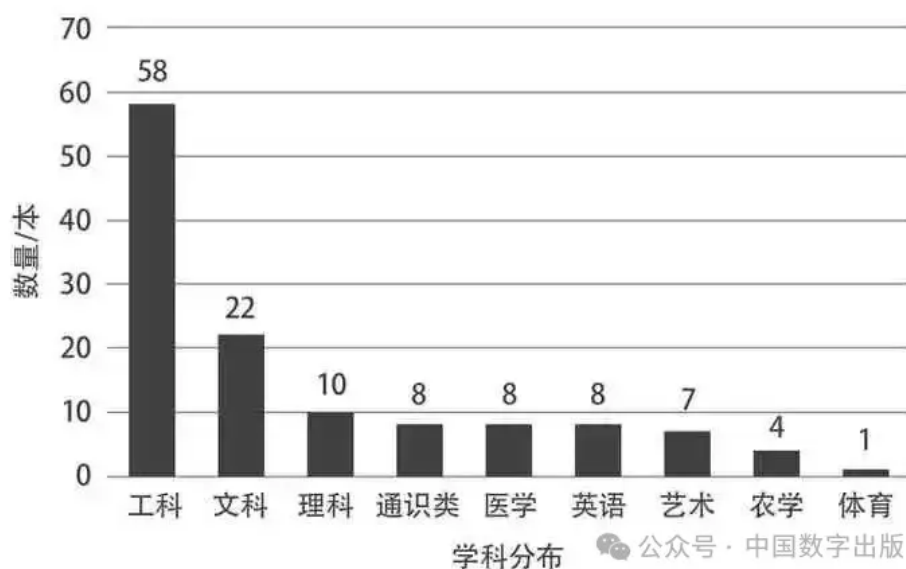


图 2 数字教材的学科分布

1.2.2 多数数字教材有纸质教材基础

本次申报的数字教材案例有 70%有纸质教材基础,即该教材已出版过纸质版本,30%为原创型数字教材。可以看出,参与遴选的数字教材大多有纸质教材基础,说明纸质教材建设的基础和经验对优秀数字教材的建设非常重要。

1.3 出版平台情况

数字教材平台呈现多元主体态势但以出版社自有为主,数字教材访问方式趋向轻量化以满足便捷教学需求。

1.3.1 出版社自有平台为主

当前数字教材的出版平台呈现多元化态势,本次遴选申报的 126 本数字教材分布在 35 个平台,平台数量非常多。其中,出版社自有平台占比 73%,第三方(技术公司)服务平台

占 27%。出版社倾向于依托自有平台发布数字教材，主要原因在于能够更好地掌控内容，确保教材质量与出版导向；保护版权，维护市场秩序；直接面向用户销售，减少中间环节。

1.3.2 网页访问成主流

数字教材正朝着更广泛的可访问性方向发展。112 本数字教材无需下载 App 或客户端即可使用，占比 89%，降低了用户使用门槛，师生通过浏览器即可随时随地访问教材。有 14 本数字教材需要下载专门的 App 或客户端访问，这些教材可能需要利用原生应用的性能优势提供更复杂的交互功能、离线访问能力，或是为了更好的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用户习惯的变化，数字教材的访问方式还将继续演进，以更好地满足教育市场的多元化需求。

1.4 定价与版本

数字教材定价策略灵活，版本以初版居多。

1.4.1 定价区间较为集中

数字教材的定价区间较为集中，如图 3 所示。定价策略兼顾了市场需求与成本效益，多数教材定价集中在 45 ~ 68.45 元之间，能够满足不同层次用户的经济承受能力。个别教材定价 0 元，表示不单独定价。同时，也存在少量高价教材，这些高价教材往往在内容深度、资源丰富度、技术应用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针对学习资源有更高要求、追求个性化学习体验的用户群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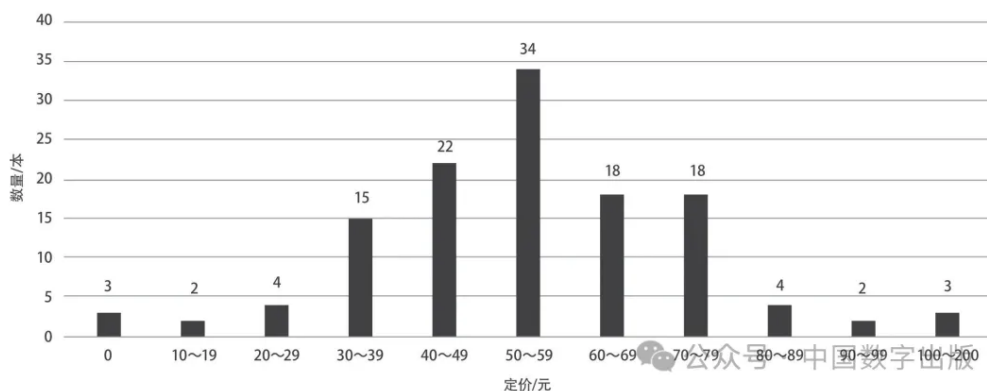


图 3 数字教材定价区间

1.4.2 大部分为初版教材

版本信息反映了数字教材的更新迭代状态，不同版本的教材在内容修订、功能优化、资

源更新等方面存在差异。从数据来看,大部分教材处于初版(第1版),少部分经历了多次迭代。更新便捷是数字教材的重要特点,也是优势所在,及时更新迭代,有利于数字教材保持时效性与适用性,为学生提供最前沿的知识与最优质的学习体验。

1.5 出版单位与主编团队

数字教材出版单位呈现多元参与的格局,主编团队以高级职称、中青年骨干为主力。

1.5.1 出版单位多元

本次申报的数字教材典型案例的出版单位共46家,呈现多元化格局。众多出版社或自建平台或利用外部平台,积极投身数字教材建设。由于各个出版单位、高校申报数量有限制,本次申报数字教材的数量不代表各出版社出版数字教材的总量。

1.5.2 高级职称、中青年骨干为主编团队主力

主编团队是数字教材质量的关键保障。从年龄结构看(如图4所示),41~50岁的主编占37%,他们经验丰富,在教程内容的科学性、严谨性把控上发挥重要作用;51~60岁的主编占35%,他们以深厚的学术积淀为教材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30~40岁的主编占比17%,这一年龄段的教师处于学术上升期,思维活跃,对新技术接受度高,能够为教材注入创新活力。不同年龄层教师积极参与数字教材的编写工作,反映数字教材在高校教师群体中得到了广泛关注,是未来教材发展的重要趋势。从职称来看(如图5所示),多数主编拥有教授、副教授等高级职称,占比达89%,确保了教材的专业水准。数字教材作者团队规模(详见图6)主要集中在3~5人,这种小规模团队有利于高效沟通、协作,充分发挥各成员的专业优势。主编职务多样,涵盖教师、教研室主任、主编等,不同角色从教学实践、团队管理、内容统筹等多维度保障教材的高质量编写,实现专业知识、教育实践与管理经验的深度融合,促进了教育内容与形式的创新,符合现代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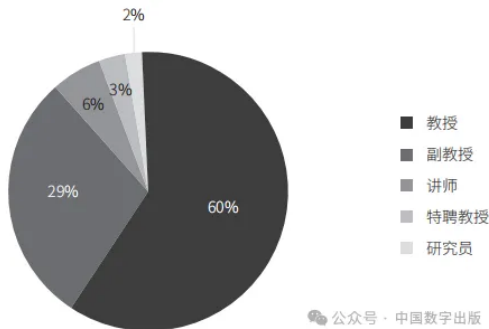


图4 主编年龄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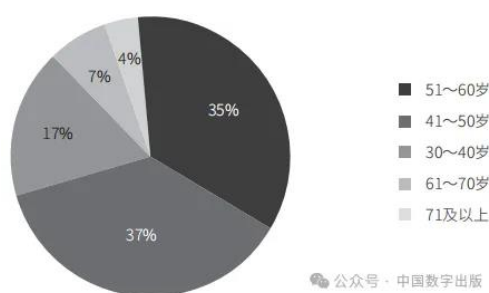


图5 主编职称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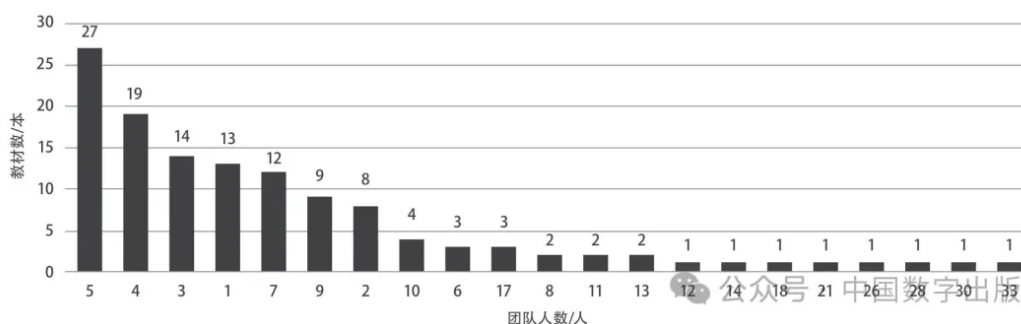


图6 数字教材作者团队人数

1.6 使用情况

从使用人数看，40%的数字教材暂没有被使用，29%的教材被少于1 000人使用。这些数据反映当前数字教材多为新推出的产品，使用率还不高，未来需要通过多途径探索，让更多学生和老师受益于数字教材，充分发挥数字教材在教育教学中的优势。

2 主要功能分析

从富媒体内容、交互功能、AI 赋能情况等方面分析本次遴选的数字教材的主要功能。

2.1 富媒体内容

数字教材整合了丰富多样的富媒体内容资源，极大地拓展了知识呈现的维度。图片通常能帮助学习者更直观地理解抽象或复杂的概念，减少文字描述，提高记忆效果。音频可能用于旁白讲解、背景音乐、音效或者语言学习中的发音示范等，通过听觉输入补充视觉信息，也可增强学习的沉浸感。视频能够展示动态过程，提供实际操作演示，简化复杂步骤的讲解，增强互动性。

本次申报的数字教材中，有图片、音频、视频的教材分别占88.0%、25.4%、94.4%。图

片和视频的高占比（均超 85.0%）符合“一图胜千言”的教学规律，尤其在需要空间思维（如工程、医学）的学科中效果显著。音频使用较少，可能因为应用场景较局限，或已被整合到视频中。从数据来看，数字教材富媒体内容的使用呈现以视觉为核心、动态化为趋势的特点，但音频的潜力尚未充分释放。未来需根据学科特性，合理配置多媒体资源，实现“感官协同”而非“视觉垄断”，以最大化学习效能。

2.2 交互功能

交互功能主要分析 126 个案例的使用体验和互动学习方面的功能，包括目录导航、浏览方式、笔记与标注功能和互动交流。

2.2.1 目录层级精炼

数字教材的目录导航需要考虑不同学习习惯与场景需求。在申报的数字教材中，123 本的目录层级为二级或三级，占比 97.6%，另有 1 本目录为一级、2 本目录为七级。目录展示教材的整体框架和各级章节关系，帮助用户概览内容结构。与纸质教材的不同，数字教材的目录更易于滚动浏览和展开细节，同时数字教材大多具有超链接、交互性、多媒体等特点，用户可能通过搜索、标签、书签等方式快速定位内容，而不仅是依赖目录，结合“3 次点击原则”等用户体验设计的原则，目录层级的设计可能需要更灵活，而不是单纯追求多层级。

2.2.2 浏览方式以翻页为主

浏览数字教材，49.2%采用“上下翻页+目录跳转”的方式，47.6%采用“上下翻页+左右跳转”的方式，2.4%采用“书籍仿真翻页”，0.8%采用“上下翻页+任务解锁”的方式。总体来看，97.6%的数字教材采用了“上下翻页”的方式，适合线性阅读，但阅读长文档时可能会效率降低，需要搭配其他的快速跳转功能，帮助学习者快速定位。而“书籍仿真翻页”则满足了部分用户追求传统阅读体验的需求。

2.2.3 笔记与标注是标配功能

笔记与标注功能为学生自主学习与知识整理提供了有力支持。有的数字教材平台有“划线”功能，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可以随时对重点知识进行划线标注，突出关键内容，方便复习回顾。有的能添加气泡注释，形成个性化的学习笔记，这些笔记不仅保存在教材中，便于后续查阅，还支持在线管理，学生可以按照课程章节、时间等维度对笔记进行分类整理，构建属于自己的知识体系，真正实现知识的内化与吸收。

2.2.4 互动交流多样

大部分的数字教材平台支持教师发布作业、发起讨论、发布测试和公告。在讨论区，师生可以分享见解、启发思路。这种讨论与协作打破了传统教学的时空限制，为师生互动、生生互动搭建了便捷平台。对于学生完成的作业和测试，通过客观题机器评价、语音评测等手段即时反馈，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够及时调整学习策略，强化薄弱环节，教师也能根据反馈数据了解学生整体学习状态，优化教学方法。

2.3 AI 技术应用赋能

本次申报的数字教材案例中，AI 技术应用初现但普及有限，智能问答与知识图谱是当前 AI 主要应用场景。

2.3.1 AI 技术应用初步显现

在当前数字教材领域，AI 技术的应用已崭露头角，数字技术所蕴含的巨大潜力正在得到充分发挥，为数字教材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整体普及率仍有待提高。在本次调研的 126 本数字教材中，有 45 本配备了 AI 功能，占比 35.71%。

2.3.2 功能场景多样，以智能问答为主

从 AI 模型来源情况来看，多数教材未明确标注所使用的 AI 模型来源。目前 AI 功能主要体现在智能问答、图谱搭建、代码解释、文本交互、角色扮演、智能检索、语言翻译等，大多针对教材本身的内容拓展。智能问答功能成为学生的随身学习助手，如《大学生心理健康教程》引入的“AI 马老师”，学生在面对心理困惑、人际交往难题时，随时向 AI 马老师提问，即可获得基于心理学专业知识与大数据分析的个性化解答，及时排忧解难；知识图谱技术则为知识体系构建提供强大助力，例如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的《语言学概论》，借助智能知识图谱将语言学各个知识点串联起来，实现知识的深度拓展与关联学习。

3 发展路径建议

本研究通过分析遴选的 126 个数字教材典型案例，结合当前业态发展情况，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供行业参考。

3.1 健全制度规范

目前，数字教材正处于快速发展和全面推广的阶段，为了确保数字教材的质量，实现其

健康发展,需要尽快出台数字教材管理意见,明确数字教材编写出版应用管理规范。针对数字教材的文本内容、配套资源和服务功能等确定建设标准,结合数字教材的特点,探索构建灵活、开放、规范的数字教材建设与管理运行机制,如多媒体资源审核、交互功能测试、AI技术伦理审查等,为数字教材的有序开发、质量管控、推广使用提供保障[2],提升数字教材的开放性、兼容性和跨平台应用能力。多部门协同,加强数字教材服务平台管理,明确责任规范,厘清各方责任。

3.2 深化理论研究

数字教材建设作为教育领域的新兴课题,理论研究的滞后性日益凸显,阻碍了其创新发展的步伐。有研究显示,当前高校、出版机构及各类研究机构以“数字教材”为主题的发文量不高、合作不紧密,很多是个体研究者的零散研究,没有形成明显的作者集群,缺乏领军人物或核心研究团队,尚未形成系统、深入的研究氛围。

应鼓励高校、出版机构及研究机构设立数字教材专项研究课题,投入更多资源,系统梳理现状、问题与典型案例,深化对数字教材建设的规律性认识[3],深入研究建设标准和规范,探索有效经验与应用模式。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借鉴国外先进理论与实践成果,结合我国国情,推动数字教材理论创新。

3.3 规范平台管理

从用户体验来看,目前数字教材平台用户体验参差不齐,部分平台功能和服务质量待完善。包括但不限于:①目录功能不够完善,部分平台目录结构混乱,层级不清晰,无法为用户提供便捷的导航服务,导致学生在查找学习内容时耗时费力;②平台稳定性不高,在遴选评审过程中,部分平台无法访问,出现卡顿、崩溃等情况;③页面设计不够人性化,操作流程繁琐,按钮布局不合理,字体、颜色搭配不协调等屡见不鲜,给用户带来不好的视觉体验和操作感受,影响师生应用数字教材的积极性;④平台数据安全、网络安全、隐私保护等存在风险,一旦发生安全事故,容易造成不良影响;⑤各高校数字教材系统仍处于“孤立”状态,尚未建立统一的接口标准,严重阻碍了数字教材的常态化、规模化应用[4]。

数字教材同纸质教材的一大区别是数字教材必须部署在平台上,依托平台提供服务。对数字教材的监管最终必然要落实到数字教材平台的监管,如建立数字教材平台备案制度,对备案的数字教材平台开展实时数据采集、质量抽查;数字教材建设单位应确保数字教材部署在安全、可靠且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的平台系统上,最终实现“用平台管平台”“用技术管技

术” [5]。

3.4 挖掘典型案例

为更好地引领我国数字教材建设的方向,相关部门应支持开展示范性数字教材试点建设,通过强导向、建机制、促建设,紧跟产业发展前沿,在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重点领域,特别是在国家急需的战略性新兴领域和紧缺专业领域,结合学科特色均衡发展,建设一批理念先进、规范性强、集成度高、适用性好的示范性数字教材。

4 结语

在产业生态构建中,数字教材将以增值策略激活发展动能。弹性定价体系兼顾普及性与个性化需求,快速迭代机制确保知识与时代同频,而演示服务、协同开发、资源共建等增值模块则将单一产品转化为“内容+服务+社交”的学习生态闭环。这种模式既赋予了数字教材持续的生命力,更通过教师、学生、出版单位的多方参与,推动教育资源在共建共享中实现价值升级。

技术的温度最终要体现在对“人”的关怀。数字教材通过大数据分析为学习者绘制精准画像,为每一位学习者量身定制专属的学习路径;以社交功能构建学习共同体,让知识在协作中深化;用无障碍设计打破教育壁垒,让每个学习者都能平等地享受优质资源。未来,数字教材将通过技术与教育的进一步融合,推动教育从“标准化生产”向“个性化成长”跨越式发展,为构建更公平、更高效、更具韧性的教育体系提供关键支撑,让知识服务的价值在每个学习者的成长中绽放光彩。

参考文献

- [1] 宋毅,王繁.教育数字化背景下高等教育数字教材的内涵特征、发展现状与建设思路[J].中国大学教学,2024(3):4-7.
- [2] 孙燕,李晓锋.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数字教材发展需求、现状与对策[J].中国大学教学,2023(12):85-91.
- [3] 张泽,毛芳.高校数字教材建设的价值向度、逻辑理路与实践路径[J].中国数字出版,2024,2(6):17-25.
- [4] 顾小清,张乐乐.教育数字化转型时代数字教材的建设方向与发展路径[J].大学与学

科,2022,3(4):82-89.

[5] 毛芳,李正福.我国高等教育数字教材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J].出版参考,2023(5):11-16.

[6] 种晓明,梅雨虹,余瑞雅.AI赋能教育出版下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出版实践、特色及启示[J].出版参考,2025(2):34-41.

(来源:《中国数字出版》2025年第5期)

“十五五”规划编制 | 未来五年教育怎么干? “十五五”规划建议指明方向

阅读提示: 10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公布。未来五年教育怎么干?“十五五”规划建议指明方向。我们梳理了其中教育相关的主要内容,一起来看——

在“‘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部分提出——

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

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显著提升,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格局基本形成,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显著增强,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快速突破,并跑领跑领域明显增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创新驱动作用明显增强。

在“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部分提出——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作支撑。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统筹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

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 建立健全一体推进的协调机制,强化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资源统筹、评价联动,促进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良性互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

- 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和国家战略需求协同育人,优化高校布局、分类推进改革、统筹学科设置,深入推进“双一流”高校和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人才集聚培养功能,培育拔尖创新人才。
- 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培养造就更多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等各类人才。
- 加强人才协作,优化人才结构,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
- 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评价导向,深化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收入分配改革,畅通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人才交流通道,激发创新创造动力活力。
- 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建立高技术人才移民制度,引育世界优秀人才。

在“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部分提出——

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学习和宣传教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
- 创新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
- 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推进校园文化建设,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青少年理想信念教育。

在“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部分提出——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 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促进思政课堂和社会课堂有效融合,加强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完善教育评价体系。
- 健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的教育资源供给。
- 稳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
- 推动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统筹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学前教育优质普惠发展,扩

大普通高中办学资源，办好特殊教育、专门教育。

- 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
- 提升职业学校办学能力，建设特色鲜明高职院校。
- 引导规范民办教育发展。
- 扩大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
- 弘扬教育家精神，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强化教师待遇保障。
- 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
- 深入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

（来源：中国高等教育微信公众号）

“十五五”规划编制 | 面向教育强国建设：高校“十五五”规划的战略主题 | 周光礼

“十五五”规划的宏伟蓝图正在擘画，高校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关键结合点，其战略规划编制承载着重大的时代使命。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高质量完成规划编制工作，这为高校谋划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发展提供了基本遵循。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高校“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需要深刻把握其发展的时空逻辑与战略核心，以系统性的变革与提升，全面应对不确定性挑战。

立足当下，面向未来，重塑高校创新发展能力。从时间维度看，未来十年是建成教育强国的决定性十年，高等教育被赋予“龙头引领”的时代重任。“十五五”时期，正是实现这一宏伟目标深入推进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关键五年。高校必须紧紧围绕这一中心议题，将自身发展融入国家战略全局，不断提高战略决策能力和组织执行能力，塑造创新发展能力，统筹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在育人方式上，要更加注重学生能力建设和人格塑造，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强化批判性思维、复杂问题解决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在办学模式上，要更加注重融合办学，强化产教融合、科教融汇，让最新科研成

果反哺教学,让学生在探究实践中成长;在管理体制上,要更加注重扁平化管理模式,完善现代大学制度,激发办学活力,使高校能够更灵活、更高效地响应内外部变化;在保障机制上,要更加注重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优化资源配置,让“无形之手”与“有形之手”协同发力。

融入大局,开放协同,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从空间维度看,高校是深深嵌入社会系统之中的开放组织。制定高校战略规划,必须树立系统观念,跳出教育看教育,跳出高校谋发展。当前,我国人口结构持续变动,国际地缘政治博弈加剧,教育数字化与人工智能浪潮席卷而来,高等教育正经历深刻变革。高校“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必须对这些宏观趋势进行深入研判,一方面,高校发展的“小逻辑”必须服从并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大逻辑”,主动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无论是服务科技自立自强、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还是助推区域协调发展,都要找准发力点,确保其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社会发展需要保持高度的适配性。另一方面,高校必须具备双重自觉,要坚定不移地扎根中国大地,汲取中国智慧,解决中国问题,培养具有家国情怀的社会主义建设者;更要具备开阔的世界眼光,强化全球高等教育与中国高等教育的互动。高校“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要以不断增强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为目标,通过高质量的国际合作与交流,使我国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世界重要教育中心。

准确定位,整合资源,打造比较优势。《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提出,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谋定“十五五”规划,高校要从多个维度进行战略抉择。一是基本办学定位。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不同类型的大学在国家教育体系中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关键在于找准自己的生态位,避免“升格冲动”导致的定位漂移与同质化竞争。二是基本办学方向。是追求“大而全”的综合性大学,还是聚焦“少而精”的特色化发展方向?对于大多数高校而言,必须敢于舍弃,聚焦有限领域打造“单项冠军”,是更为现实的卓越之路。三是服务面向。要对自身长短板有清醒认知,敏锐洞察外部机遇挑战,精准定位服务半径,在引领全国、服务区域、深耕行业等现实场域打造竞争优势。成功的战略,不仅在于明智的“抉择”,更在于抉择之后的坚定“执行”。“十五五”时期,是中国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系统性转变的关键五年,每一所高校都应以高度的历史自觉、深刻的自我剖析和前瞻性抉择,整合资源、持续深耕,推动形成百花齐放、各具特色的高等教育新格局。

(来源:《中国高等教育》2025年第20期)

“十五五”规划编制 | “十五五”时期教育改革发展面临的形势、问题与思路 | 马晓强

AI 导读：“十五五”时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关键阶段，教育改革发展面临经济高质量发展、人口结构变革、社会治理现代化及国际竞争深化等多重形势。当前教育主要矛盾已从“量”的普及转向“质”的提升，存在学生负担重、师资发展不足、资源配置不均、人才供需错配及创新型人才匮乏等问题。为此，应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强化思政教育与身心健康；加快新质生产力所需人才培养，推动职教改革与高等工程教育创新；构建普惠优质的教育公共服务体系，促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拓宽国际交流渠道；推进弹性学制与高中多样化发展，并大力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教育转型，以系统性改革支撑国家发展战略。

导读内容由 AI 智能生成

“十五五”时期是全面建设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加速期，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承上启下的关键期，是《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的落地落实期。教育改革发展将面临经济、社会的新形势和由此导致的新问题，与此相适应，必须在人才培养体系和机制上采取新的举措，为“十五五”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多数量、更高质量的人才和智力支持。

“十五五”教育改革发展面临的形势

经济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依靠教育创新提供支撑。“十五五”时期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迫切需要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从依靠生产要素投入转向依靠生产率提升。与发达国家相比，目前我国劳动生产率居于中等偏下水平。特别是以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物技术等为特征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对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产生深远影响。面对经济发展的效率提升和动能转换，必须要求以教育支撑服务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以教育之力厚植人民幸福之本，以教育之强夯实国家富强之基。

人口结构深刻变革，迫切需要教育主动识变、应变、求变。“十五五”时期我国老龄化、少子化和区域人口增减分化仍将持续。老龄化加速推进，预计中国将在2030年前后进入占比超20%的超级老龄化社会。我国出生人口仍将持续下降。如不采取有力措施，人口负增长将成为长期趋势。人口大规模流动将长期存在。面对人口结构性变化与大规模流动长期存在的现状，教育必须主动迎接挑战，有效应对人口结构变化形势。社会治理现代化面临新任务，

迫切需要教育发挥均衡调节作用。“十五五”时期我国社会结构将发生深刻变化。新就业群体规模持续扩大,新型灵活就业求职者占比从2020年一季度的18.6%上升至2023年一季度的23.2%,社会治理面临新形势新任务,中等收入群体将成为未来经济社会的主流,对教育的需求抱有更多新期待和高要求。城镇化将进入“下半场”,农业转移人口将加快“市民化”。迫切需要以教育统筹促进城市群经济带协同发展,必须把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作为工作中心。

中国日益走近国际舞台中央,迫切需要依托教育打造大国外交新形象。国际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和教育的竞争。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方面教育要更加主动积极融入国际教育大格局之中,积极参与国际教育前沿研究和政策对话,提升中国在国际教育改革发展中的话语权;另一方面,要充分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辉煌成就,建设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世界重要教育中心。

教育改革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教育“量”的问题总体解决,“质”的问题更加突出。教育普及水平实现历史性跨越,但人民群众对“上好学”的期盼愈加强烈。在学生素质发展方面,存在学生学习负担过重、身心健康堪忧等问题。在教师队伍建设方面,我国已拥有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教师队伍,但教师准入渠道单一、门槛偏低、专业发展后劲不足,部分教师难以适应新时代人才培养需要。在国际交流合作方面,存在“出不去”“引不来”“讲不好”等问题,西方国家对我国出国留学学生设置障碍,来华国际学生仅占世界总量的3.5%,中国教育的国际传播力有待提升。

城镇化和区域分化明显,教育资源错配与闲置更加突出。未来5年,我国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龄人口还将持续向城镇流动,义务教育学校“城挤乡空”趋势加剧,小规模学校的发展问题仍将非常突出。区域间“一位难求”与“空心化”现象共存。人口大量流入区域教育资源短缺、教育竞争加剧等问题日益突出,而人口流出区域则可能出现教育资源利用不足、闲置或浪费问题。

人才供需匹配度不高,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从供需匹配看,行业市场人才需求端与高等教育人才供给端错位,“有活没人干”和“有人没活干”的结构性矛盾突出。从就业能力看,新质生产力发展催生出一批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对人才培养规模和质量提出新的更高要求。从就业观念看,大学生“求稳”心态仍然明显,考公考编热度不减。对职业教育仍然存在偏见,高技能人才总量不足、结构不优、素质不高,培养体系滞后于产业需求等老

问题和新困难并存。

战略型人才短缺,人才培养能力不足问题更加突出。一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能力不足。教育理念、体系、制度、内容、方法和治理模式还不适应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需要,学科交叉深度不够,单一学校难以满足开展紧贴产业一线所必需的科研和教学资源。二是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的集聚保障机制还不健全。跨部门、跨地区、跨行业、跨体制调集领军人才的机制尚未完全建立。三是卓越工程师培养与生产实践相脱节。高校“工科理科化”现象较为严重,教育评价仍然偏重理论研究和论文,对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重视不够。

“十五五”教育改革发展的重点方向

创新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要着力加强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体系建设。整体谋划设计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根据不同年龄段特点,制定标准、设计教材和教辅读物,强化不同学段衔接贯通。重点抓好学生身心健康促进工作。坚定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着力破解“小眼镜”“小胖墩”和学生心理健康等突出问题。明确美育劳动教育时间要求和能力标准,进入课表。为每个中小学校配置至少1名专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建立全国学生心理健康监测与预警一体化系统。

夯实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人才基础。加快创新创造人才自主培养体系建设。把加快“双一流”建设作为重中之重,聚焦“卡脖子”技术,建立重视数理基础、学科交叉、人文素养三位一体的贯通式培养模式,自主培养能够攀登科学高峰的拔尖创新人才。探索以“举国优势、校企协同、链式布局、交叉融合”的集中式办学模式建设国家人工智能学院、国家集成电路学院等。全面促进人力资源二次开发。面向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进行职业教育系统性重构和调整,做大做强高等职业教育,提高劳动者的供需适配水平;探索形成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工程师培养体系。

构建普惠可及便捷的教育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促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加快推进学前一年免费教育,降低家庭保育教育成本。着力完善县(区)普惠性幼儿园布局规划,持续增加公办资源供给,构建以公办园为主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持续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发展城乡教育联合体、加大区域间合作、委托管理、教师轮岗等形式,提高中西部农村学校教育质量,缩小校际差距。健全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农业转移人口随迁子女入学保障政策,以公办学校为主将随迁子女纳入流入地义务教育保障范围。办好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

以教育家精神引领教师队伍建设。健全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和教书育人能力。扩大实施“国优计划”,支持更多“双一流”高校为中小学培养研究生层次优秀教师。加强高质量的教师培养培训体系建设,实施教师数字素养提升行动。持续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提高教师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职业地位。健全完善教师工资待遇保障长效机制和收入分配激励机制,切实提升教师职业的吸引力和幸福感。

开辟教育国际交流合作新通道。吸引全球高层次人才来华留学和工作。打造“留学中国”品牌。设立以吸引海外顶尖人才、培养未来全球精英为目标的卓越留学项目。完善来华留学生实习就业签证和居留许可制度。有组织推进职教出海。面向周边国家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国际合作示范区,推动教育资源随企出海,布局职业教育、工程技术境外办学,打造鲁班工坊品牌。推动中文国际传播,开发中文软件服务、影视、游戏等文化产品,扩大中华文化传播力和影响力。

深化改革释放教育高质量发展红利。探索推进弹性学制。学生可以根据自身的学习进度和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节奏,允许他们缩短或者延长学习年限。促进学制贯通,构建一体化育人体系,实现课程的有机衔接和知识的深度融合。探索推动高中教育分类均衡发展。在坚持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的同时,探索推进高中教育均衡发展,为所有高中阶段学生提供有选择、有特色、无差别的教育服务。完善人才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以人才需求为导向,优化高校层次类型和区域布局,优化国家调控、省级统筹、高校自律的学科专业动态调整机制。

更大力度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教育变革转型。持续推进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打造集成化、智能化、国际化的学历教育服务平台和终身教育服务平台,构建“人工智能+教育”新模式。探索数字赋能大规模因材施教、创新性教学的有效途径。加快建设智慧教育大模型,支撑全面智能化转型,打造新形态数字教材,推动教育资源服务供给侧改革。提升师生智能素养,提升智能时代人才核心竞争力,强化价值观塑造与伦理安全,建立健全智能时代教育治理体系。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2025年10月14日)

院校研究 | 论院校研究的主体 | 刘献君 赵彩霞 周进

摘要: 我国院校研究主体呈现“一核多元”的特征,以高校领导为引领,院校研究专业

人员为核心,职能部门行政人员与师生群体共同参与,形成多主体协同系统。新形势对院校研究主体能力提出了新要求。加强院校研究专业人员培养需运用系统思维和数字化方法,重点从体系化、制度化建设入手,即完善专业教育体系,强化在职人员能力提升,优化职业发展环境,加快推进技术创新与应用。实现院校研究多主体协同,要建立各尽其职、首责优先的制度流程,围绕共同目标,实现共同创造,强化数据共享与技术支持,创建特色模式,完善统筹协调机制,不断推进院校研究走向成熟。

关键词: 院校研究; 多主体协同

一、认识院校研究的主体

对院校研究主体的探索,伴随院校研究的全过程。2003 年全国首届院校发展学术研讨会在甘肃天水召开,90 余位与会学者就院校研究主体范畴这一主题展开了深度探讨,其中“领导者参与合法性”议题引发了持续争议。有学者认为“领导者、管理者如果参加院校研究,就会因其主观愿望和意志影响院校研究的科学性”,主张决策者应与研究场域保持必要的张力;有学者则基于行动研究范式,认为“院校研究是行动研究、咨询研究,研究的目的在于咨询,在于提高决策的科学性,而问题的解决、决策的科学性都有赖于领导者和管理者”。^[1]笔者持后者立场。此外,研究主体及其边界等衍生问题亦构成重要讨论维度。2014 年 5 月华中科技大学院校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对全国 878 所本科院校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运行状况进行了调查研究,进一步揭示了机构转型背景下主体重构的必要性,提出“在机构转型中深化院校研究”。认识院校研究主体,不仅是提升主体性自觉的过程,也是院校研究范式转型的时代要求。

主体和客体相对应。主体是指对客体有认识和实践能力的人,是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承担者。主体具有意识性、自觉性和能动性,以及社会历史性。在认识活动中,主体通过思考和实践,积极寻求知识,对客体进行理性分析,不断拓宽对世界的理解。客体是主体活动所指向的对象。主客体相互作用、相互转化。

认识院校研究的主体,首先要认识院校研究的客体(即院校研究的对象)。院校研究是一个发展的概念,具有实践性、复杂性特征,核心是通过系统分析为高校管理提供科学依据。笔者认为,院校研究本质上是通过系统的科学方法解析高校管理中的复杂性问题,以实现治理效能提升为目标的自我研究、管理研究、咨询研究和应用研究。主客体关系的特殊性体现在院校研究的目的是服务高校实践,其对象并非静态的“物”,而是动态的、嵌入高校具体

情境的战略“管理活动”与重大“决策问题”。院校研究客体范畴包括高校战略管理、决策数据分析、学生事务与学习过程、教师教学与学术活动、资源管理与效能优化、组织文化与政策评估等。[2]

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我国院校研究主体突破了传统“主客二分”的框架,呈现“一核多元”的特征,即以高校领导为引领、院校研究专业人员为核心,职能部门行政人员与师生群体等共同参与,形成多元主体协作系统。以下简要分析各主体的职责和作用。

1. 高校领导是院校研究的引导者

高校领导战略认知决定着院校研究的价值实现程度。院校研究是高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院校研究机构的行政隶属关系决定院校研究高度依赖校领导的引导和重视。现代决策科学表明,科学决策需要智囊系统与决策系统的互动。高校领导作为战略决策主体,是院校研究的“制度设计者”与“需求发起者”。

领导层的主动需求是院校研究发展的核心动力。事实表明,凡是院校研究开展得好的学校,共同点之一都是领导重视。例如,北京大学设立“北大研究”项目,通过领导层发起院校研究课题,旨在鼓励和支持全校师生“立足北大、研究北大、服务北大”。院校研究的重要职能之一是为学校领导提供决策支持,如果领导没有决策支持意识,不重视科学决策,院校研究无从谈起。领导者引导院校研究的主体责任体现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组建院校研究机构和队伍,明确其在决策链中的法定地位,将院校研究纳入学校重要工作范畴。第二,提出学校在建设和发展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引导全校深入开展研究。第三,创建校级数据中台和综合数据平台,打通专业研究人员与职能部门和师生交流的渠道,为院校研究创造良好条件。第四,完善学校决策制度与数据文化,在决策过程中预留政策创新空间,明确重大议题须附院校研究论证报告,推动“经验决策”向“循证治理”转型。

2. 院校研究专业人员是院校研究的核心推动者

院校研究机构的核心职能是服务决策,重点是针对高校内部的数据分析和政策研究,提供决策支持,帮助学校作出科学决策。美国学者沃克文较早定义了院校研究专业人员的角色,即“信息分析师、政策分析师、舆论导向专家、学者及研究员”。[3]也有学者从提供的服务的角度强化院校研究专业人员作为“行业分析师、知识经纪人”的角色。可见,专业人员是院校研究的中坚力量和核心推动者,其职责具有较高的技术性和专业性。

院校研究人员的专业角色和能力直接决定院校研究的科学化水平。其主体任务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数据治理与决策分析。收集院校绩效数据和环境数据、分析和解释收集的数据，并通过统计分析、预测建模、数据挖掘等技术，将数据转化为信息并生成可视化报告，以支持规划和管理中的决策。第二，战略规划与效能评价。开展基于证据的战略变革设计与效能评价，通过分析内外部环境预测学校未来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在制定战略规划文本时，探索战略目标、战略主题、战略阶段、战略重点及战略行动，基于效能评价提出资源配置建议等。第三，政策研究与制度创新。通过政策研究提出合规性报告，及时识别组织高效运行中的痛点，促进对内对外的有效沟通，提供数据驱动的解决方案。这三个方面融“研究、咨询、服务”为一体，构成了我国院校研究专业人员职能的“金三角”。

3. 职能部门行政人员是院校研究的重要主体

高校职能部门行政人员作为院校研究的关键行动者，兼具“数据生产者、政策执行者、资源协调者”等多重身份。职能部门是高校管理系统中的核心组成部分，负责保障高校的正常运转和持续发展，在教育理论与实践、政策制定与实施、领导与师生联系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相较于欧美高校的扁平化治理结构，中国特色科层制管理体系赋予职能部门独特功能：首先，我国高校“以条为主”的管理模式，是由业务部门驱动的决策体系，职能部门处于纵向决策链条的节点上；其次，在高校治理架构中，党委部门约占校级管理机构总数的1/3，这一组织体系通过把握办学方向、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履行党委统一领导的核心职能。

职能部门行政人员在院校研究中发挥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第一，数据支持与情报生产。职能部门行政人员在收集和管理数据方面有天然的优势，通过数据的收集、管理和分析，帮助识别趋势和问题，为院校研究，特别是决策支持提供基础。第二，政策转化与方案执行。职能部门行政人员基于自身的研究和实践，为规划与政策的制定提出建议，并推动方案执行和评估。第三，资源配置与沟通协调。职能部门行政人员要协调研究与实践、教学与科研、领导与师生等关系，合理分配资源并提高资源使用效率，确保院校研究成果的落实。第四，技术支持与能力建设。院校研究需要运用相应的技术手段，职能部门行政人员可为其提供技术支持。如建立和维护信息系统，确保数据安全和可用性；为教职工提供技术培训，提升院校研究能力等。

4. 师生是院校研究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师生是院校研究的最终服务对象，他们是院校研究的“数据提供者、治理共建者、效果

验证者和成果受益者”，师生参与体现了治理民主化与教育人本化，能够形成“自下而上”的问题发现机制，直接决定了院校研究的合法性与有效性。

高校管理有行政管理和学术管理，相应地有学术管理决策和行政管理决策。为学术管理提供决策支持，必须依靠学术人员；学科建设、专业设置、课程管理等方面的决策支持，必须有懂学术管理的教师参加才能完成。学校的很多决策要由教师来执行，他们在执行中的反馈意见对检验决策的科学性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大学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院校研究要服务于学生成长，高校决策应以学生为中心来实施。高校决策是否有利于学生成长，学生作为直接感受者，其反馈意见最为直接有效。因而，院校研究者在为学校提供决策支持时，要广泛听取学生意见。还必须看到，教师和学生作为大学的主要成员，具备较高的知识水平和分析问题能力，完全有能力参与院校研究，为学校的发展提供支持。教师和学生在校研究中的作用包括关注学校的建设与发展，积极反馈对学校决策的感受，并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建议。

二、提升主体的院校研究能力

院校研究主体是一个多元协作系统，各主体都需要提升院校研究能力。关于职能部门行政人员、教师和学生的能力提升，将在其他相关论文中阐述，本文重点探讨院校研究专业人员能力的提升。

1. 提升院校研究专业人员能力的历史实践

在过去二十多年的院校研究发展历程中，为提高专业人员的研究能力，我国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1)构建专业化培训体系。自2004年起，我国逐步搭建起院校研究专业人员的培训体系，通过定期举办针对性培训班加以落实。该培训体系主要依托三种模式展开。

一是“学术会议+研讨班”模式。在校研究学术会议召开之前，围绕会议主题，预先开展研讨班活动。这种模式既能培养专业人才，又能提升学术会议的质量。例如，2004年，首届以“院校研究与现代大学管理”为主题的院校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武汉举办。会前主办方举办了高级研讨班，吸引了国内113所高校的200余名校长及专家学者参与。美国院校研究协会主席及7位国内外院校研究学者在会上作了学术报告。与会人员通过深入研讨，对院校研究在现代大学管理中的作用有了更深刻的理解。2006年，在西安召开“大学校长与战

略”国际学术研讨会之前，主办方也成功举办了一场研讨班，并取得了预期效果。

二是“集中式培训班”模式。针对院校研究中亟论院校研究的主体待解决的关键问题，集中举办培训班，旨在提升院校研究人员的专业能力，推动院校研究的深入发展。例如，2012年8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院校研究分会与美国海外华人院校研究会在杭州联合举办了“大学数据系统与分析”院校研究培训班。该培训班围绕“院校研究设计与数据分析”、“高等教育数据系统的构建与应用”、“问卷调查的方法与实践”三个核心议题，采用了小班授课、实践演练和现场答题等多种教学方式。8位美国院校研究领域资深专家与来自国内50多所高校的120多位学员共同探讨，培训效果显著。

三是“高校现场会”模式。以常熟理工学院为例，该校高度重视校园信息化建设，于2006年制定了《常熟理工学院数字化校园“十一五”规划》，将数字化校园建设提升到服务学校发展战略的高度。2012年4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院校研究分会在该校举办了“院校研究信息系统建设和运用培训班”，吸引了全国60多所高校的130多位院校研究专业人员参与。参与者通过现场参观、听取讲解、深入研讨等方式，共同探讨高校信息系统建设及运用。此类培训班聚焦“系统分析”、“数据管理”等核心技能，采用案例教学与实战演练相结合的方法，有效提升了研究人员的政策解读与决策支持能力。

(2)改革研究生培养方式。我们主要进行了以下探索：

一是优化课程设置。在现有高等教育学、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生学位授权点，开设“院校研究概论”、“院校研究专题”等课程，加深学生对院校研究理论与方法的理解，并强调对实践问题的研究，以提升其实践研究能力。高等教育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了由刘献君主编的首部教材《院校研究》，并于2022年推出该教材的第二版。

二是推进专业学位建立。2002年起，我们就提出在充分试点的基础上建立教育博士专业学位以培养院校研究专门人才的建议。[4]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通过举办“大学校长博士课程班”进行实践探索，积累了有效经验。2009年，包括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在内的15所高校被批准为首批教育博士专业学位教育试点单位，2010年开始招生。

三是将院校研究纳入研究生教育体系。2022年，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自主设立院校研究二级学科，并于2024年招收首批院校研究专业博士研究生。这一改革使该专业毕业生兼具理论素养与实践能力，在培养院校研究专业人员方面进行了开创性探索。

(3)搭建开放交流平台。除上述措施外,我们还通过多种方式培养院校研究专业人员:每年召开一次大型学术研讨会及多种形式的小型研讨会,在交流、探讨中提升院校研究人员的能力;建立院校研究案例库,将成熟的案例汇编为系列丛书出版,至今已推出7册,为院校研究人员提供实践参照;组织撰写院校研究相关著作,在编写和使用的过程中提升专业研究人员的院校研究能力;推动院校研究专业人员深入参与高校管理实践,通过合并职能相近部门(如整合发展规划处与高等教育研究所)促进行政管理人员与专业人员协作;引进国外先进的院校研究理念和方法,鼓励和支持院校研究专业人员参与国内外学术会议和课题研究等。这些举措不仅提升了院校研究专业的专业素养,也促进了整个院校研究领域的发展。

2.新形势对院校研究主体能力提出新要求

我国院校研究经历了初步形成、规范发展阶段,如今正迈向成熟。其成熟的标志包括形成系统的理论、知识和方法体系,建立完整的专业人员培训体系,院校研究机构普遍设置且全面展开研究,构建健全的交流协作网络 and 平台,营造良好的研究环境和氛围。[5]促进中国院校研究走向成熟,需要进一步转变观念,建立制度,完善平台,优化环境。

我国院校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不少问题。在我国院校研究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恰逢我国处于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战略期,同时面临教育数智化转型、现代化治理、高质量发展等多重环境变革,这些都对院校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院校研究功能从决策支持转向治理效能,更加关注整体变革、风险预测、态势感知与办学特色;院校研究服务对象从面向管理者扩展至服务师生,更多地关注学生个性化需求;院校研究内容既要关注宏观议题,又要深入微观议题;院校研究目标既要关注院校决策,又要关注院校运行;院校研究的方法与流程,既要关注数据分析,又要关注数据治理。面对新形势,院校研究专业人员的能力和素质难以适应要求,如数据科学技能薄弱,复合型知识结构欠缺,对新兴领域的敏感度不够,过于依赖传统研究方法,前瞻性研究能力不足,决策分析能力偏低,伦理与合规意识不强等,这些方面都有待提高。

院校研究专业人员作为连接数据与决策的“转化者”,应构建“T型能力结构”,在情境知识、技术智能和专业素养三个方面实现迭代升级。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复合知识结构。院校研究从业者除了深耕教育管理与院校研究理论外,还需具备战略管理与政策情境知识(如院校治理、战略规划、质量评估、组织管理角色等)、院校研究与数据科学知识、跨学科知识(如教育学、管理学、统计学、计算机科学)等,以形成“混合”型智能结构。第二,

决策分析能力。知识本身无法直接解决问题,院校研究人员需要扎实掌握科学研究方法与技术(如 AI 协同工具、混合研究方法、多源数据整合、预测模型构建),具备问题情境与数据叙事能力(如情境理解、分析诊断与报告可视化)、政策推导与规划设计能力、跨部门协作能力(如组织沟通、项目管理、成果转化、资源协调)等。通过跨界整合与智能协作,将数据洞见转化为可执行的改革方案。第三,职业伦理素养。院校研究人员职业素养决定了研究的战略高度、伦理底线与社会价值。战略思维与创新意识推动研究者着眼长远发展,跨文化素养拓展其国际视野及变革适应性,数字伦理素养防止技术异化和数据滥用,终身学习确保专业人员具备敏捷迭代的成长心态,职业道德则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导向守护研究的客观性与独立性。院校研究人员通过系统化的理论素养训练与实践能力的培养,成长为复合型人才。

3.以体系化、制度化加强院校研究专业人员培养

面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形势以及中国院校研究走向成熟的新要求,深化院校研究专业人员培养,需要运用系统思维方式和数字化方法,在体系化、制度化建设上下功夫。

(1)完善专业教育体系。高校在现有基础上,要加强院校研究二级学科建设,强化专业学位人才培养,推动与计算机科学、管理科学以及工程、社会学等多学科交叉,增设院校研究专业方向,培养具备跨学科能力的院校研究者。在培养过程中,强化实践导向的课程设计,增强教育教学的针对性;围绕“数字素养、政策分析”等核心能力素养,开设模块化课程;构建 AI+IR 虚拟仿真实训平台,采用“双导师制”(即校内导师+行业人员),指导学生完成院校研究课题;开发院校研究数字化教学案例库,根据技术演进更新教学内容,推进院校研究人才培养专业化、课程动态化、学科交叉化。

(2)加强在职人员能力提升。一是建立分层分类的培训体系,针对新入职人员,提供技术智能、院校事务基础认知及政策解读等培训;对资深人员,提供深化数据分析、研究设计能力及跨部门协作培训;针对领导层,提供战略决策支持、组织智能等培训。二是创新自适应联合培养,如组建“院校研究区域联盟”,共享专家资源与课程体系;建立“微认证”学分体系,联合开发“院校研究云课堂”等模块化微课,将政策分析、数据可视化等技能拆解为可积累的模块化课程,支持在职人员根据自身需要“随时随地”提升院校研究能力。三是鼓励项目化协作参与,细分院校研究主题,促进远程协作研究,积累实战经验;建立关联岗位机制,如职能部门与院校研究机构人员交叉轮岗,推动实践成果双向转化。

(3)优化职业发展环境。国家层面要完善社会问责制度,将开展院校决策咨询作为资源配

置和效能评估的依据；高校层面要坚持“决策必循证”原则，将院校研究作为学校决策的必要程序。在高校岗位设置中，明确院校研究作为专业技术岗位的独立性，拓展行政与学术双向职业通道与晋升机制，将院校研究成果的决策采纳率、服务效能纳入考核评价指标和职称评审加分项。

(4)推动技术创新与应用。构建覆盖教学、科研、管理全流程的集成化数据系统，强化数据清洗、标准化和可视化能力。[6]例如，嵌入 DeepSeek 等大模型建立本地知识库，开发决策支持工具，引入机器学习算法，建立智能化的院校研究分析模型，对学生成长、资源配置等关键指标生成可视化报告并预测趋势；部署 BI 可视化工具(如 Tableau 动态仪表盘)，实时呈现院校变化，利用 AI 构建学习画像预警系统，预测学业质量风险；对师生访谈等非结构化文本进行情感分析，识别师生高频诉求，推动决策快速响应。构建院校研究信息共享平台，降低重复性研究成本。

三、实现院校研究主体间的协同

协同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体通过协调一致的行动，共同完成某一目标的过程。其必要性源于三重张力：

第一，平衡多元利益诉求。不同主体的工作任务和利益不同，其关注点与着力点也有所不同。例如，学校领导更关注学校的整体发展和声誉，院校研究专业人员侧重研究的科学性与自身水平提升，职能部门聚焦决策执行和本部门利益，教师关注学术自由、学校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学生则更在意自身成长与发展。第二，行政与学术的逻辑存在冲突。大学存在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学术权力侧重真伪判断，行政权力侧重利益、利害判断，由此产生控制性思维和协调式思维，并体现在不同主体上。第三，部门数据孤岛与决策全景化需求的冲突。单一主体难以覆盖院校研究全链条，单一学科背景也难以应对复杂问题，而协同能够整合分散资源，破解“数据孤岛”与决策偏差问题。因此，做好院校研究需要多主体协同(见表 1)。

表 1 院校研究多元主体的比较分析

主体	角色定位	核心职责	优势	局限性	协同需求
高校领导	引导者	组建院校研究机构 和队伍,提出学校重 大发展问题,创建数 据平台与决策制度, 形成循证决策文化	战略决策权与资源 调配能力,对院校研 究的制度设计与方 向的把控能力	主观意愿可能影响 研究的客观性,缺乏 专业分析时间	需与专业人员协作确保科 学决策,需协调职能部门数 据支持,需建立师生参与机 制
院校研究 专业人员	核心 推动者	数据治理与决策分 析,战略规划与效能 评价,政策研究与制 度创新	专业性与技术能力 (即数据分析、建模 等),跨学科知识整 合能力	对实际执行环节了 解不足,缺少跨部门 协调职能	依赖职能部门提供数据,需 与领导层目标一致,需通过 师生反馈来验证研究成果
职能部门 行政人员	重要主体	数据支持与情报生 产,政策转化与方案 执行,资源配置与技 术支持	掌握部门核心数据, 熟悉政策执行流程, 具备资源协调能力	部门利益可能导致 数据壁垒,全局视角 与分析能力有限	需与院校研究专业人员共 享数据,需领导层明确协同 机制,需师生配合政策实施 与反馈
师生	参与者与 受益者	提供数据与反馈,参 与治理共建,验证决 策效果	直接感知政策执行 效果,学术与实践智 慧相结合,推动民主 化治理	缺乏专业研究方法 训练,参与时间与精 力有限,反馈渠道可 能不畅	需制度化参与渠道,需专业 人员指导与反馈,需职能部 门透明化政策执行信息

1.各尽其职，首责优先

院校研究主体协同应以清晰的权责划分为基础。院校研究机构要明确自身核心功能，避免偏离“服务决策”这一目标。在实际操作中，遵循“首责优先”的原则，即根据工作内容确定主要责任人，谁的责任更重，谁就拥有优先发言权和决定权。

首责优先制需要明确各主体的核心职能与优先责任边界。在跨部门项目中，可实行“首责主体+协作单元”模式，明确核心主体作为第一责任人，赋予资源调配与协调权限，形成梯度责任体系：高校领导要提出“真问题”，制定协同章程制度，明确优先级任务的责任主体；院校研究专业人员专注综合性、战略性分析，承担数据治理与政策转化职能；职能部门根据业务属性开展专题研究，聚焦决策执行并提供标准化数据；师生群体通过制度化渠道参与研究、反馈建议，形成“参与即贡献”的责任机制。同时，引入动态问责机制，制定责任清单和决策流程，避免“集体负责等于无人负责”，确保数据透明度与决策问责，形成“权责对等、动态响应”的协同机制。

2.共同目标，共同创造

学校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院校研究的根本目的是推动学校的建设和发展，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同时又有阶段性的目标，院校研究要围绕共同目标，发挥各主体能动性，实现共同发展。

基于共同目标的协作文化是院校研究的核心动力。协同的本质是多元主体通过知识交互实现价值共创，将数据共享与开放纳入核心价值观，这是跨部门合作的文化基础。密歇根大

学院校研究办公室要求研究人员与教师定期开展“数据工作坊”，将教师的教学需求转化为可操作的研究议题，通过联合项目制实现行动研究闭环。这种协作模式使教师从被动接受数据结论转变为主动参与分析。[7]文华学院倡导“以学生为中心”的核心教育理念，建立“围绕共同目标，师生共同创造、实现共同发展”的组织文化。在个性化教育改革中，该校基于“为每个学生创设自主发展的空间”的共同目标，通过“制度性交流”等方式推动全校开展院校研究，将研究任务分解为“清单+典型”，校领导提出决策议题并发挥核心协调作用，形成全员参与共同创造的“大院校研究”氛围。

共同创造是多元主体基于制度约束与技术赋能，通过资源交换与意义协商实现集体行动的过程。一方面，院校研究专业人员应与各主体共同参与问题解决，并将研究成果反哺实践；另一方面要加强外部联动，推行“问题导向型协同研究”，将院校研究任务分解为“小微任务包”，从职能部门和师生中抽调人员成立跨部门小组，项目完成后被抽调人员回归原部门但保留协作接口。通过制度设计固化协作流程，确保协同动力不因人员流动或领导更替而中断。

3.数据共享，技术支持

技术支持是协同的基础，协同需要打破“数据孤岛”，建设标准化数据平台，实现技术工具支持。数智化时代，有效的数据决策需要四个主要条件，即人员、技术、流程和文化。院校研究机构应承担“数据管家”职能，通过数据标准化加速教育统一数据平台和共享数据库建设。实施数据标准化需要强大的数据治理系统，院校研究机构可通过学校“数据治理委员会”，明确定义数据统一标准、计算规则与数据来源，解决数据格式复杂性问题，消除不同使用者因“标准歧义”带来的数据误差和理解偏差，将数据共享治理纳入激励与问责机制，确保决策者聚焦议题本身而非数据争议。

突破部门数据壁垒需要超越简单的数据共享，建立“数据即资产、协同即力量”的数据文化，由共享到互信，由互信到合作。借助生成式 AI 等智能技术快速整合多源异构数据，建立“院校研究决策支持智能协作系统”，采用区块链技术和“联邦学习”技术，规范数据使用权限、责任归属及共享流程，在保护数据隐私的前提下实现跨部门联合建模，形成开放联结的多主体协作生态。

4.建立模式，统筹协调

模式是指事物的标准样式，是主体行为的一般方式，是理论和实践之间的中介。一个事

物只有形成了一定的模式,才具有可操作性和推广价值。院校研究需要建立一定的模式,以协调主体间的矛盾、冲突,协同一致。

目前部分学校建立的数据驱动模式、专题研究模式、共同创造模式值得借鉴。“数据驱动模式”以数据分析为核心,运用科学定量方法辅助决策,强调数据的收集、挖掘与可视化应用,其核心是形成“数据采集——智能分析——决策优化”的闭环。例如,同济大学整合发展规划处、高教研究所和信息中心,利用机器学习模型预测学科发展趋势,优化资源配置。

“专题研究模式”聚焦院校发展中的关键问题,通过系统研究提出针对性解决方案。如南方科技大学“南科大研究”提出“由下至上、多维需求、小机构大用人”的专题研究模式;华中科技大学通过“专题研究”组织编写《中国院校研究案例》,促进跨校经验共享。“共同创造模式”整合校内外多主体力量,通过协作形成研究合力,强调跨部门、跨角色的参与式决策。文华学院采用“1+X 协同体”模式,以数据为资源,以分享有价值的决策知识为起点,通过开放协同的组织文化引导全校参与院校研究。

每所高校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和研究任务的复杂度,突破单一模式,创造性地创建特色院校研究模式。未来,高校还可构建院校研究“虚拟协同体”模式,利用元宇宙技术模拟构建沉浸式协作场景,在虚拟环境中预演政策实施效果,验证规划方案合理性,降低决策试错成本,解决跨时空协同低效问题。

院校研究主体协同的深层动力源自对院校研究价值理性的认同。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体现为多元主体通过科学方法与制度创新,回应复杂客体的实践需求,最终服务于高校治理现代化的目标。主体需提升数据能力、协调价值冲突;对客体的研究需兼顾政策适配性、社会问责与学术合法性。未来的院校研究需在组织独立性、方法创新与文化融合中实现主客体良性互动,构建中国的“院校研究共同体”。智能时代院校研究将走向“人工智能赋能人类智慧”(AI+HI)的多主体新生态,多主体协同的本质是重构高校的“治理基因”,通过首责制明确行动边界,以共同价值消解目标冲突,以数智技术打通数据孤岛,以弹性模式激活组织韧性。其创新不仅需要制度设计,更需塑造一种“共同创造”的组织文化,使多元主体在“共担、共创、共享”中推进院校研究不断走向成熟。

参考文献:

- [1][4] 刘献君.大力加强院校研究,推动现代大学管理[J].高等教育研究,2005,26(1):35-39.
- [2] 刘献君.院校研究论略[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6,27(5):27-34.

[3] VOLKWEIN J F. IR: What Is It All About? New Directions for Institutional Research[M]. San Francisco: Jossey Bass, 1999: 9-19.

[5] 刘献君, 陈敏, 张俊超. 中国院校研究走向成熟的条件、标志及对策[J]. 高等教育研究, 2020, 41(9): 32-39.

[6] 蔡三发, 靳霄琪, 刘雨萌. 数据治理视域下院校研究的信息化创新路径——以 T 大学为例[J]. 现代教育管理, 2023, (1): 22-30.

[7] 雷洪德, 黄敏. 美国密歇根大学培养院校研究专业人员的典型经验[J]. 高等教育研究, 2019, 40(11): 51-58.

(来源:《高等教育研究》2025 年第 2 期)

院校研究 | 高校职能部门开展院校研究的实践形式、现实问题与提升路径 | 张俊超 牛睿

摘要: 进入数智时代, 高校职能部门作为院校研究的重要实践主体, 在推动院校研究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调查发现, 职能部门开展院校研究主要有日常事务型、工作专班型、多部门联动型以及项目驱动型四种实践形式。职能部门开展院校研究主要存在数据瓶颈、决策惯习、人员障碍和协同不力等方面的问题。职能部门有效开展院校研究应从推进高校数据治理, 推动院校研究制度化, 提升行政人员院校研究能力以及构建院校研究协同联动机制入手。

关键词: 高校; 职能部门; 院校研究; 实践形式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智技术的快速发展, 高校管理和决策模式正经历着数智化驱动的一系列变革, 院校研究面临着新的需求和挑战, 其主体角色和功能边界进一步拓展。院校研究不仅要成为领导决策的“望远镜”, 更需深耕高校关键领域, 发挥“显微镜”作用。院校研究的内容从注重学校宏观战略研究转向涵盖职能部门工作领域的微观研究, 如学生发展、师资建设、科研创新、财政事务等。而高校职能部门作为院校研究的重要主体, 在推动该领域深入发展和高校管理决策科学化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近些年来, 美国高校除了普遍设立专门的院校研究机构外, 许多高校的职能部门也纷纷设置数据分析、决策支持等相关岗位, 围绕各自的业务领域开展院校研究活动。美国院校研究会 (Association for Institutional

Research)原主席兰迪·斯温称这种模式为“院校研究的联邦网络模式”(Federated Network Model of Institutional Research),它表明除了院校研究机构本身,其他部门和单位也在迅速拓展其院校研究功能。[1]

我国高校专门设立“院校研究办公室”的数量较少,多数高校的院校研究分散在高等教育研究所、发展规划处等部门,尚未形成有效协同机制,导致院校研究开展实效与功能发挥均受限。从我国高校决策的实际情况看,无论日常事务管理决策还是重大事项决策,决策支持主要依靠职能部门。[2]职能部门作为占据高校决策系统重要位置的中枢组织机构,为院校各项事务决策提供参谋咨询,成为院校决策和政策制定的“智囊系统”。

2024年7月,华中科技大学院校发展研究中心组织召开了主题为“数智化转型下高校职能部门开展院校研究的价值与路径”的学术研讨会,会议围绕这一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之后,组建课题组对全国多所高校职能部门开展院校研究的情况进行了调查。课题组成员从2024年7-11月对7所不同类型本科高校的32位职能部门负责人进行了深度访谈。受访人员包括3所“双一流”建设高校中的12名职能部门负责人(编号S1-S12),3所地方本科高校中的16名职能部门负责人(编号D1-D16),1所民办本科高校中的4名职能部门负责人(编号M1-M4),这些受访对象来自教务处、科研处、人事处、财务处、学生处等9个职能部门。基于访谈内容,本研究梳理了我国高校职能部门开展院校研究的主要形式,分析职能部门开展院校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而提出职能部门推进院校研究的实施路径。

一、高校职能部门开展院校研究的实践形式

我国高校职能部门作为学校的参谋协调机构,享有学校决策的重要参与权,也是学校各项制度、政策的组织制定者,其主要职能:一是为学校领导决策提供“参谋咨询”,二是为学院发展提供“服务协调”。[3]开展院校研究既是职能部门履行决策咨询职责、提升服务能力的必然要求,更是新时代提升高校管理决策有效性与科学性的关键驱动要素。调查发现,当前我国高校职能部门开展院校研究的实践形式主要归纳为以下四种。

1.日常事务型

我国高校一般采用“直线职能制”的组织结构,即大学——学院——学系垂直管理与职能部门参谋协调相结合。该结构的核心特征是决策权与参谋权分离,职能部门对学院、系等直线单位不具备领导和指挥权,而是通过信息收集、方案制定和评估反馈,为校级分管领导提供决策支持,同时为院系业务提供服务咨询。

开展院校研究是职能部门的职责使然。其日常事务包含大量院校研究任务,这些任务属于常规业务工作,具有日常性、专业性和重复性特点。一方面,学校层面各类业务场景的决策支持(如人才培养、学科专业建设与评估)以及政策文件、校级制度(教学、科研、人事、财务类)的制定,均需相关职能部门依据国家方针政策和学校发展目标,组织调查研究、分析数据信息,拟定备选方案并参与决策论证。另一方面,职能部门日常业务(如年度计划制定、课程教学管理、科研项目评审、人才引进与考核、学生奖助评定、后勤保障等)也需通过出台制度、方案或办法提供决策支持。

职能部门服务院系的职能经常被强调,在行政管理体制下,高校职能部门对院系具有一定的行政管理权,并掌握着院系办学所必需的人财物及其资源配置权。为科学分配资源、协调院系利益,开展院校研究不可或缺。很多与院系发展和切身利益相关的业务服务、资源配置方案设计,都需要职能部门通过深入调研收集院系需求数据,并基于系统性分析形成决策支持。正如某“双一流”建设高校学科建设办公室副主任 S4 指出,该校在开展学科建设经费分配、绩效评估、学科结构调整等工作时,依托学科信息管理系统采集和分析各学科的相关数据,对各院系的学科水平进行科学客观的评价,为学科资源优化分配和学科高质量建设提供依据。再如某地方本科高校招生办公室主任 D13 表示,编制招生计划需要深入各院系充分调研,并进行大量数据收集和分析,科学制定招生目标,以提升资源配置效能。

2.工作专班型

工作专班型院校研究指高校职能部门针对重大专项任务决策需求,抽调人员组建跨部门工作专班,通过专业协同提出方案的实践形式。该机制具有临时性、跨领域与快速响应的特点。高校工作专班常以“领导小组”“工作组”等组织形式存在,如“双一流”建设领导小组、校庆筹备工作领导小组、疫情防控工作组、网络安全应急工作组等。工作专班成员来自不同职能部门,接受统一领导和统筹协调,其扁平化的管理体系有效减少了组织协调与信息传递中的内耗。现实中,职能部门“条块分割”现象严重;不同部门之间不仅存在沟通壁垒和协作难题,其传统运作模式更难以适应非常规跨部门决策需求。而工作专班型院校研究通过整合跨部门资源、汇聚多领域专业力量,有效突破了职能部门间的条块壁垒,精准匹配决策需求。这种创新机制能确保专项院校研究工作在特定时段内实现高效推进。例如,受访的7所高校中,有4所高校为应对教育部实施的普通高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于正式评估的前一年成立了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工作专班。这些高校的工作专班由职能部门抽调综合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人员组成,主要任务是在规定时间内分阶段分头收集和汇总各类信息

数据,拟定决策方案并为上级领导小组决策提供建议。审核评估工作结束后,工作专班解散,被抽调人员返回原岗位。

3.多部门联动型

职能部门在开展院校研究时,普遍需要多个部门协同联动。高校决策中涉及多部门的综合性事项,需由相关职能部门协同共享数据信息,制定整体解决方案以实现共同目标。在多部门联动型院校研究中,通常由校级管理层指定牵头部门负责组织与协调,通过召开联席会、协调会或推进会审议工作方案,由牵头部门部署实施并建立配套保障制度,最终形成可持续的协同联动机制。高校发展战略规划编制是多部门联动型院校研究的典型案例,受访对象均参与过学校发展规划制定:发展规划处负责总体协调并担当沟通枢纽,纵向联动校决策层,横向协调各院系;各职能部门作为专项规划编制的“主力军”,通过条块协同整合资源信息,共同推动战略规划的制作与实施。

在数智时代,数据互联互通和数据一体化平台的建设为多部门联动型院校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与保障。通过整合分散在各职能部门的多源异构数据,能够有效打破“数据孤岛”,促进跨部门数据业务的协同创新。如某“双一流”建设高校学生工作部副部长 S9 介绍,该校构建了学生画像智能分析系统,该系统共享和融合了学生处、教务处、财务处、后勤处等多个职能部门的业务数据。基于大数据和智能分析技术,系统对学生学习行为、身体健康、经济状况等多维特性展开智能化分析,并提供学业预警、就业倾向、心理健康风险识别等前瞻性预测功能。部门负责人只需点击进入“处长驾驶舱”,便可实时掌握与动态监测学生画像信息,为学生工作提供精准、智能化的决策支持。

4.项目驱动型

项目驱动型院校研究作为我国高校独特的院校研究形式,通过设立专项课题聚焦本校管理问题,以专项经费激励参与,其成果服务于高校管理决策优化。不同于学术科研课题,院校研究项目具有显著的应用导向:选题来源于本校教育教学、人才培养和管理实践中的重点难点问题,成果形式以决策咨询报告、调研报告、制度文件等为主。

该项目机制鼓励行政人员参与,既促进职能部门行政人员专业素养发展,又推动创新性研究成果转化。如南方科技大学发起的“南科大研究”系列项目,北京大学设立的“北大研究”项目,烟台理工学院院校研究课题项目等。职能部门行政人员通过申报课题,将科学研究与分析方法同院校治理智能化相结合,形成“以项目促研究,以研究出成果,以成果助发

展”的良性循环,为高校管理决策的科学化提供有力支持。某地方本科高校研究生院院长 D6 表示,“管理人员在申报和开展院校研究项目的过程中,紧密围绕学校改革发展和管理实践中遇到的现实问题,运用科学理论和方法深入研究,为高校管理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某“双一流”建设高校科研处处长 S3 认为,“参与院校研究项目可以提升管理人员的研究能力、专业水平和创新意识,促进管理人员专业化发展”。

上述职能部门开展院校研究实践的四种形式,在任务类型和工作特点方面存在差异,其主要区别如表 1 所示。

表 1 高校职能部门开展院校研究的主要形式

主要形式	任务类型	工作特点
日常事务型	单个职能部门开展常规业务工作	日常性、专业性与重复性
工作专班型	从多个部门抽调人员完成非常规任务	临时性、跨部门协作与快速响应
多部门联动型	多个部门共同参与的常规业务工作	日常性、跨部门协作与综合性
项目驱动型	职能部门成员针对学校管理的重点难点问题申报并完成专项课题	专业性、跨部门协作与创新性

二、高校职能部门开展院校研究的现实问题

院校研究是以系统收集、分析高校运行数据为基础的决策支持体系。迈克劳林（G. W. McLaughlin）和霍华德（R.D. Howard）等人总结的院校研究信息支持流程指出,院校研究人员在信息支持过程中,担任数据保管者、加工者和使用者的角色,从各种途径收集数据,对各种数据进行加工处理,最终提交决策者或管理者辅助决策。[3]这一过程受数据、人员、决策者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虽然我国高校职能部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院校研究实践,为各个层面的决策事项提供了科学有效的支持,但访谈发现,在推进院校研究实践过程中,普遍存在数据瓶颈、决策惯习、人员障碍、协同不力等共性问题,阻碍了职能部门的院校研究效能发挥。

1.数据瓶颈：数据质量低，数据共享机制不健全

高校数据具有多样化、多源化、多维化的特点,分散存储于各职能部门的业务信息系统中。因职能部门管理要求、技术规范及业务性质存在差异,导致数据格式与标准不统一,数据质量参差不齐。某“双一流”建设高校财务处副处长 S5 指出,“职能部门数据不一致的情况非常普遍,给统计和整合数据带来了很大的麻烦”。某民办本科高校学生处处长 M2 提出,

“有些部门数据维护不及时，数据不完整、不准确，无法提供有效支撑”，职能部门不仅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对数据进行清洗转换，还可能因数据不准确、不一致导致决策失误。

虽然高校众多职能部门普遍建立了自己的信息管理系统，但各部门、各系统之间存在“信息孤岛”“数据烟囱”，导致数据源分散、数据整合系统不完善。如某地方本科高校人事处副处长 D3 认为，“目前学校信息系统过多，形成了多个‘数据孤岛’，部门间数据不能流通和共享，跨部门跨系统的数据分析和决策面临障碍”。许多高校尚未建立校级统一数据共享平台和配套管理机制，导致跨部门数据调取需经过层层审批。这不仅增加了数据收集的时间成本，还严重削弱了数据的时效性与工作效率。受访者普遍反映“其他部门数据获取困难”，“跨部门数据整合受阻”，“多部门协作效率低下”。

2.决策惯习：经验主导，基于数据的决策文化尚未成熟

当前，以数据为导向的决策文化在我国高校已初具雏形，但离数据文化的成熟还存在较大距离。[4]承诺、支持、愿意使用数据来支持决策是成熟数据文化的特征。我国高校领导者普遍经历多岗位锻炼，管理经验丰富，但在决策中易过度依赖经验。长此以往，高校内部很难形成对数据价值的普遍认同与重视氛围。如某地方本科高校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中心主任 D14 指出，“部分领导不需要咨询和支持，常凭经验、魄力快速决策”。

职能部门在开展院校研究的过程中，对数据的使用容易流于形式，未能将其作为决策的核心依据。数据分析停留在表面，未能深入挖掘数据中的复杂关联和潜在价值。整体来看，高校对院校研究的需求和支持程度不够。某地方本科高校科研处处长 D2 坦言，“我们对数据的使用停留在数据报表层面，主要是为了应对上级的检查评估，进行深层次挖掘分析的情况不多”。某“双一流”建设高校本科生院副院长 S10 谈到，“我们的工作聚焦于领导核心理念，基于领导的想法提供数据和信息来佐证，对外部报告尤其如此，需对重要数据进行调整和‘美化’”。

3.人员障碍：专业化水平不高，院校研究的意识和能力有待提升

虽然越来越多的高校职能部门开始招聘具有信息学科背景和数据统计分析能力的工作人员，但大多数人缺乏相关专业的正规教育，在职培训的机会也不多，加之事务性工作繁忙，即使专门从事院校研究的人员，也不太专业。[5]调查显示，我国职能部门行政人员来源结构复杂多元，专业知识和业务水平参差不齐，数据挖掘与分析的专业技能普遍薄弱，缺乏既掌握数智技术又熟悉高等教育管理的复合型人才。某地方本科高校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部副部

长 D1 指出,“行政管理队伍中普遍存在管理人员来源复杂,专业知识欠缺和业务素质不高的情况”。某地方本科高校教育教学中心副主任 D7 认为,在决策支持中,“最主要的问题是我们用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服务科学决策的能力还不足”,难以满足更加高效、精准的决策支持需求。

此外,很多职能部门行政人员在提供决策咨询时存在路径依赖,习惯于传统的工作模式,被动地依据“经验”和“规章”机械化、消极化工作,不注重自身专业素养和院校研究能力的提升。某地方本科高校人事处处长 D4 说,“我们还是沿用老办法,根据上级政策和下发的规章文件,参考以前处理类似问题的经验,大家也都习惯了,按这个来不会出错”。从面向全校教职工的院校研究项目申请情况来看,职能部门参加的人数占比较少,部门来源较为单一,参与院校研究项目的积极性不够高。某民办本科高校教务处处长 M1 说,“学校的院校研究项目大多是教学和科研部门的人参与,职能部门参与的较少:一是我们工作太忙没时间,二是觉得自己研究能力有限”。

4.协同不力:“条块分割”现象突出,部门之间沟通协作不畅通

在高校管理体系中,由于主管部门在“条块”架构中权力及资源相对集中,各职能部门在行使职权与资源分配时缺乏统一协调,形成各自为政的分散状态。[6]部门间缺少沟通协作,数据信息不交互,各职能部门仅聚焦于业务职能范围内的碎片化研究,很难推行基于跨部门信息整合的院校研究,从而丧失了为学校整体性改革与发展提供全局性、系统性决策支持的能力。某“双一流”建设高校教务处处长 S2 指出,“各职能部门独立运作,有自己的目标和利益,很难从学校整体层面考虑问题,决策支持欠缺全局性”。尤其严重的是,由于不同部门对应的上级领导不一,各职能部门存在目标差异和利益冲突等问题,部门之间相互推诿的情况时有发生,多部门联动的院校研究任务难以高效落实。某地方本科高校校长办公室主任 D11 认为,“在工作中多部门之间的协调是最难的,相互推诿和扯皮的现象屡见不鲜,有很多事情推进不下去,必须得让校领导出面协调才能解决”。

三、高校职能部门推进院校研究的实施路径

1.推进高校数据治理,建立覆盖多个业务场景的院校智能体系

高校数据治理通过全流程标准化管控提升数据质量与共享效能,为院校研究提供支撑,在数智化转型中驱动决策优化与数据价值释放。要想达成这一目标,高校应建立强大的院校智能体系。院校智能体系亦可称之为决策支持系统[7],该体系具备数据整合、分析挖掘及智

能决策支持等综合功能,对接教学、学生、科研、人事等业务系统数据库。各职能部门可通过平台直接处理数据,利用数智技术工具深度挖掘,自动生成可视化分析报告与决策建议,实现跨业务场景的智能化决策支持。我国部分高校的院校智能体系建设走在前列,如同济大学构建了国内首个院校研究数据分析系统,创新性地采用兼具自助式和探索式的院校智能分析工具,形成了适合“1+N”多个业务场景的应用格局。武汉理工大学创建校长——处长——院长“三级链接”数据驾驶舱,聚焦关键领域和关键指标,实现对学校运行态势的实时洞察与精准分析。

2. “自上而下”推动院校研究制度化,大力鼓励职能部门开展院校研究

王建华曾指出,我国院校研究的真正出路在于制度化。[8]在现有体制下,高校开展“自我研究”、进行“自我改进”的内驱力仍然不足,导致我国院校研究尚未进入高校管理决策的中心,也未在职能部门中得到普及。为此,需要“自上而下”地推动院校研究,把院校研究由“柔性需求”变为“刚性制度”。

首先,政府实施教育数字化转型战略为院校研究提供了重要机遇。在此背景下,高校应积极响应政策号召,利用院校研究全力推动管理决策的数字化转型。其次,高校领导必须认识到开展院校研究的必要性,将院校研究嵌入高校领导决策制度与决策论证、审议的关键环节,与高校职能部门“无缝”衔接,与职能部门共同创造和经营高校内部行政管理科学决策的供需市场。[9]最后,高校领导要以战略眼光统领院校研究工作。具体来说,依据院校定位、发展目标与面临的挑战,确定院校研究的关键领域,如学科建设优化、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师资队伍结构调整等,将其确定为职能部门的重点研究目标,做职能部门院校研究工作的引导者。同时,为职能部门开展院校研究提供制度激励,如将院校研究与部门的绩效考核紧密衔接,设立院校研究专项经费,建立院校研究成果转化平台等。

3.提升职能部门行政人员的院校研究能力,“选育用留”塑造院校研究专业人才

院校研究组织智能理论提出,院校研究人员应具备技术与分析智能、事务智能、情境智能三方面的知识能力。[10]事务智能和情境智能对于职能部门行政人员来说具有“主场优势”,而技术与分析智能往往是职能部门行政人员的“软肋”。2021年3月,信息技术咨询公司Gartner发布“2021年十大数据和分析(D&A)技术趋势”,这些趋势表明数据分析不再是一项次要的活动,而是转变为一项核心的业务职能。[11]行政人员应认识到数据在业务工作中的重要价值,不断提升数据分析和使用新技术的能力。

进入数智时代,传统的数据技术已不再适应快速变化的环境对于提供更精准、科学且更智能化的决策方案的需求,行政人员应持续学习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数据建模、预测分析等新兴技术,当然,这一切有赖于学校的支持。学校可建立“选育用留”四位一体的院校研究人才培养体系:“选”即选拔掌握数据科学技能,熟悉高等教育,具有复合型知识结构和创新思维的人才;“育”即提供日常培训、资助学习、交流访学等培养通道,助力行政人员不断精进业务技能,更新数智技术;“用”即为他们提供实践锻炼的机会,如参与院校研究重大项目,多部门交叉轮岗,承担院校研究课题;“留”即以制度保障留住院校研究人才,建立合理的薪酬体系,规范考核评价,提供良好的职业发展空间,对在院校研究工作中取得突出成绩者给予奖励。

4.以数智赋能职能部门高效协同,构建院校研究协同联动机制

数智时代高校既有的治理结构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与重塑,通过数据治理和建立院校智能体系有望打破职能部门“条块分割”的困境,形成院校研究协同联动机制,这一过程本质上是数智技术驱动下组织形态与治理逻辑的系统性重构。

首先,数智技术推动治理结构从“层级科层”向“网络化协同”演进。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打破了传统部门间的物理隔阂与信息壁垒,高校通过建立整合数据平台、院校智能体系等,可促进跨部门院校研究资源调配和任务执行的扁平化与动态化。其次,随着数字化平台的普及,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院校研究协同体正在初步形成。职能部门与院校研究专业人员、师生领导、院系组织、社会机构等利益相关方之间的联系愈发紧密,利用数智技术能够将各方资源信息整合在一起,打造互联互通的智能决策分析平台,准确把握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与决策服务效率。最后,在数智化的基础上引入矩阵项目型的院校研究组织结构。纵向以牵头部门为核心,赋予其项目负责人权力,项目负责人直接向决策者汇报;横向以决策事项为中心,建立多个部门共同参与的决策事项项目组。这一结构使职能部门的职能分工与项目合作、技术专业性和行政有效性有机结合,增强了多主体协同的适应性与灵活性,进而构建起多主体协同的院校研究协同联动机制。

参考文献

[1] 刘献君.决策支持:院校管理中一个被忽视的重要领域[J].高等教育研究,2022,43(7):48-53.

[2] 李福华.治理现代化视野中高校职能部门的管理决策[J].高等教育研

究,2021,42(11):49-56.

[3]McLAUGHLIN G W, HOWARD R D, CUNNINGHAM L B,etal. People,Processesand Managing Data (2nded.) [M]. Tallahassee: AssociationforInstitutional Research,2004:11-14.

[4]张俊超,鲁梦琪.我国高校数据文化的现状及培育——兼论院校研究的作用[J].高等教育研究,2020,41(12):40-47.

[5]雷洪德,黄敏.中国院校研究专业人员的培养目标及其实现路径[J].高等教育研究,2020,41(9):45-49.

[6]张俊超,韩宝成.协同矩阵:院校研究发挥决策支持功能的组织结构[J].高等教育研究,2022,43(7):64-68.

[7]常桐善.构建院校智能体系:院校研究发展的新趋势[J].高等教育研究,2009,30(10):49-54.

[8]王建华.论我国院校研究的现状、问题与出路[J].高教探索,2007,(3):5-9.

[9]王建华.高校管理事务的专业性与院校研究的制度化[J].高校教育管理,2018,12(1):7-12.

[10]TERENZINI P T. Onthe NatureofInstitutional Researchand the Knowledge and Skills It Requires [J].New Directions for Institutional Research, 1993, 34(1):1-10.

[11]Gartner 发布 2021 年十大数据和分析技术趋势 [EB/OL].https://www.gartner.com/cn/newsroom/pressreleases/gartner_2021_.

(来源:《高等教育研究》2025年第2期)

人工智能 | 当教育留下伤痕: 学生为何依赖人工智能(AI)的代笔困境 | 埃内斯托·雷耶斯

阅读提示: 10月22日,高等教育内幕(Inside Higher Ed)官网刊发美国加州弗雷斯诺城市学院(Fresno City College)英语讲师恩尼斯特·雷耶斯(Ernesto Reyes)的文章,文章探讨了学生使用人工智能的原因及其背后的深层次因素。作者通过与学生的对话和教学经

验，揭示了许多学生依赖人工智能的原因，包括缺乏写作能力和自信、教育系统对错误的污名化以及边缘化社区学生的特殊挑战。作者提倡通过伦理方式利用人工智能，并强调努力和坚持是写作技能发展的关键。文章原文标题为“询问你的学生为何使用人工智能（Ask Your Students Why They Use AI）”。以下是文章要点。

在当下关于人工智能（AI）在教育中应用的广泛讨论中，恩尼斯特·雷耶斯（Ernesto Reyes）通过其社区大学（Fresno City College）英语教学实践指出，许多学生转向人工智能并非出于投机取巧，而是源于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感和过往教育经历的创伤。这一发现揭示了推动学生进行学术不端行为背后更深层、更紧迫的系统性问题。

雷耶斯分享的两个案例极具代表性：一名男学生在被警告后仍持续使用人工智能完成其民族志论文，原因在于他自认不是“好作家”，且高中阶段从未写过超过一页的论文，甚至认为学校“什么也没教给他”。这种深刻的自我怀疑导致他在课堂上封闭自我，不愿参与讨论。另一名在线课程的女学生表达了类似的心声，她提到中学时期就被许多人“放弃”，高中阶段挣扎求生，最终得出结论——“我知道我不够聪明”。两位学生均为来自小城镇的西班牙裔第一代大学生，他们的经历暗示了边缘化社群学生可能普遍面临的支持缺失问题。

作者观察到，这种现象与肯·罗宾逊爵士（Sir Ken Robinson）在其著名 TED 演讲《学校是否扼杀了创造力？》中所批判的教育文化紧密相连。学生们对罗宾逊关于“教育将错误污名化”的观点深表认同，这反映了他们在初等及中等教育阶段，因无法完成任务而深感“愚蠢”的经历对其大学阶段的自信造成了持久的负面影响。雷耶斯的教学环境——加州中部的一所社区学院——汇集了多元背景的学生，包括应届高中生和拥有不同间隔年的成人返校生，其中许多人是家族中首位大学生，这使得他们更容易因准备不足而产生写作焦虑。

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学生对人工智能的使用都是不当的。在实际教学中，雷耶斯鼓励学生像对待维基百科（Wikipedia）一样，以合乎伦理的方式利用人工智能。通过课后表单调查发现，约半数学生会承认使用了人工智能，但其用途主要集中在头脑风暴、格式引用、校对建议或改写措辞等辅助环节。真正利用人工智能生成整篇草稿的情况实属罕见，多数情况是生成引言或部分主体段落。这区分了作为学习工具的人工智能与作为代笔替代品的人工智能。

问题的核心在于，那些最倾向于滥用人工智能以生成全文的学生，往往是那些在进入大学前未能获得必要写作指导、对写作过程最为陌生的群体。他们内心充满了对自身能力的严

重不安。对此，雷耶斯在其教学实践中做出了关键干预：他明确向学生传达，“好坏作家”之分是一个伪概念，真正的区别在于“经验丰富”与“缺乏经验”的写作者，而写作是一项可以通过努力和坚持来发展的技能。他将此理念写入教学大纲的“努力公式(Effort Formula)”中，并通过围绕失败与创造力主题设计的作业，以及鼓励重写与修改的政策，试图重塑学生的学习心态。

当前关于人工智能在教育中巨大潜力的兴奋讨论，必须与对学生为何首先选择不道德使用人工智能的根本原因的审视相结合。如果忽视了那些长期存在的、导致学生感到准备不足并将错误视为耻辱的教育系统缺陷，那么任何关于课堂内人工智能应用前景的对话都将流于表面，失去其应有的意义。归根结底，学生求诸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应对机制，暴露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即在某些教育环境中，任务的完成度而非真实能力的发展成为了常态，而犯错依然被污名化。在探讨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环境代价等实质性弊端的同时，解决这些驱动学生走向代笔的深层教育创伤，无疑是更为根本的任务。

(来源：高等教育内幕(Inside Higher Ed)官网)

他山之石

博士学位制度的法国模式：特点与争议——以专业博士学位设置为中心的考察 | 卞翠 卢威 孙阳

摘要：多样化是全球博士学位制度发展的重要特征。不同于美国等国家，法国没有实行博士学位分类，而是在单一的博士学位体系下，通过博士生合同与工业研究培养协议两种机制，分别培养学术型和应用型人才。以两大机制代替学位分类，是法国博士学位制度的鲜明特点。当然，近年来，法国也曾出现发展博士专业学位的动议，但这一改革却面临诸多争议，以致举步维艰。国家对博士学位制度的垄断，根深蒂固的精英价值观与平等价值观的影响，以及当下社会需求不足，是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尽管从静态视角观之，这种博士学位制度模式目前可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但从动态视角看，由于没有对博士学位进行分类，法国博士生教育在培养应用型人才方面还存在局限，面向未来，现有人才培养模式不足以供给足够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

关键词：学位分类；博士学位制度；专业博士学位；法国

（来源：《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25 年第 8 期）

美国博士研究生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跨学科创新及其启示——基于斯坦福大学 SHIPS 项目的案例考察 | 田贤鹏 史洁

摘要：在全球化的人才竞争中，具有跨学科协作能力的博士研究生拔尖创新人才备受青睐，如何推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跨学科创新已成为世界各国高校面临的迫切议题。以斯坦福大学 SHIPS 博士项目为例，深入考察博士研究生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跨学科机制及其深层影响机制。结果发现：美国博士研究生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跨学科机制呈现四方面特征：一是“跨学科+问题”双向驱动的跨学科理念引领；二是“母学科+跨学科”矩阵组合的跨学科知识整合；三是“厚基础+强思维”互补嵌入的跨学科课程供给；四是“内协同+外联动”资源聚集的跨学科系统支持。研究认为，博士研究生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跨学科机制构建应当始终贯穿“学科为基、问题导向”的跨学科复合育人理念；强化“横向扩展、纵向深入”的跨学科课程群建设；着力突破“院系为界、学段壁垒”的跨学科组织限制；全面建设“政校企社、协同共育”的跨学科系统生态。

关键词：跨学科；SHIPS 项目；拔尖创新人才；斯坦福大学；博士研究生

（来源：《研究生教育研究》2025 年第 4 期）

专业学位博士生教育中的档案袋评价：缘起及其在英、美、澳的实践 | 王东芳 刘晶

摘要：档案袋评价因其注重教育过程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多样性，且彰显了专业学位博士生教育的实践性特征等优势，得以在英、美、澳等研究生教育发达国家的专业博士学业评价中广泛应用。专业博士档案袋的基本架构包括：档案袋基本情况概述、所参与的专业实践项目的详细叙述、学术论文或报告、反思性内容和证明材料。但由于不同学科特质及教育模式存在差异，专业博士档案袋具体内容的呈现和反思性实践的程度存在学科差异。我国可通过如下举措推动档案袋评价：选择应用性较强的学科实施专业博士档案袋；促进专业学位博士生教育相应培养环节的完善；加强校企合作并提升企业参与力，推动专业博士档案袋的有效实施。

关键词：专业学位博士生教育；档案袋评价；质量评价

（来源：《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25年第2期）

英国教育博士实践能力的培养路径与启示——基于伦敦大学学院教育学院的案例研究 | 李文文 张金鹏

摘要：伦敦大学学院教育博士培养目标聚焦实践能力，秉承满足社会发展需求与关注个人能力发展的理念，通过设置基于实际经验的课程、引入 CFG 交互性教学方法、构建完善的学业指导机制及探索定向工学融合项目，构建了以实践能力为重心的人才培养路径。借鉴伦敦大学学院的成功经验，我国的教育博士专业学位教育应平衡课程的理论与实操、引入新的教学手段、完善学业指导体系、创新项目开发，以解决教育博士培养学术化倾向问题，培育出实践能力更强的研究型专业人员。

关键词：实践能力；实践性；教育博士；培养目标；伦敦大学学院教育学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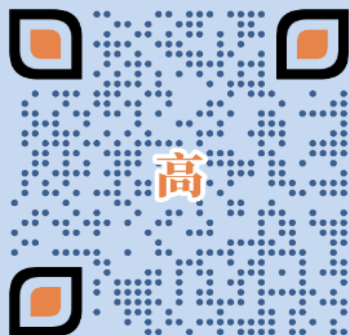
（来源：《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25年第3期）

学科评估如何以评促建：美国明尼苏达大学 GRIP 计划的实践与启示 | 崔育宝 吴兆胜 秦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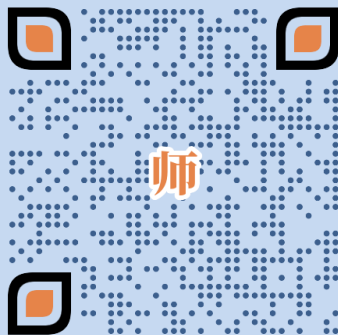
摘要：针对当前学科评估与学科建设中存在的评建分离、以评促建作用发挥不足等问题，介绍了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实施的一项新型的研究生教育项目评估模式——研究生教育评估和提升计划的评价理念、组织架构、实施流程、主要特征、实施成效及面临的挑战。在此基础上，从重视开展自主的自我评估、坚持以人为本和行动导向、强化能力建设与资源支持、促进利益相关者深度参与等四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以推动我国高校开展学科自我评估活动，切实发挥学科评估以评促建的作用。

关键词：学科评估；研究生教育；GRIP；以评促建；明尼苏达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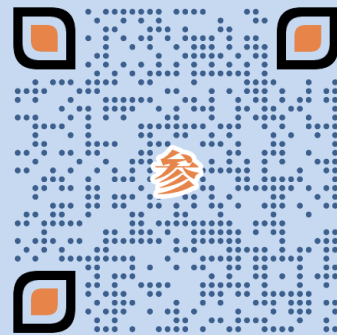
（来源：《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25年第4期）



高等教育研究所



教师教育专题信息



高教决策参考

高教决策参考
2025 年第 23 期
第 2 卷第 23 期·总第 34 期
2025 年 10 月 31 日发布

上海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200234 上海市桂林路 100 号
徐汇校区西部计算中心 2 楼
<https://ghc.shnu.edu.cn>